



让我们携手前行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伴随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在改革开放 35 周年,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八项规定”的出台,党中央已经为全国人民做出表率。

只有播种,才会有收获;只有拼搏,才会获得成功。

新的一年,让我们携手前行!



西安地方志

2013·第1期

(总第220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卷首语

让我们携手前行 (1)

特载

《西安历史大词典》首发式暨研讨会举行
..... (4)

专家学者介绍和评价《西安历史大词典》观点摘登
..... (5)

我们的村落

仁义村 仁义宏信社区居委会 (10)

南关村 南关社区居委会 (11)

橡凹沟 孙兴盛 (12)

历代名人与西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外交家——冯 嫫
..... (15)

学术交流

试论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
..... 张世民 (17)

人物春秋

怀念西安人民的好市长——张铁民
..... (20)

史料钩沉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4)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博弈内幕 (25)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被“冷落”内幕 (27)

当年美军为何没有烧毁靖国神社? (29)

西安风情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一)——景曜门 (32)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户县社火	(富小云整理) (34)
文史拾趣	
毛泽东与康有为的《大同书》	(35)
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38)
清宫选秀女并非选美	(40)
杜甫八方求援盖“草堂”	(42)
中国最早四位女留学生的故事(一)	(43)
蛇年说蛇	(47)
志鉴动态	
《碑林区志(1994~2008)》正式出版发行	吉 勇 (49)
《西安百年大事要览(1911—2010)》出版	(49)
《那时长安》出版	(50)
《缓堵保畅西安行(一)》出版	(50)
知识窗	
妙趣横生“元旦”谜	(51)
何为“古籍善本”?	(51)
古籍善本保存有三忌	(52)
红黄绿灯之源	(52)
“疆场”原来是错别词语	(54)
历代诗人咏长安	
《寒食》	(唐)韩 翃 (55)
解字	
“小”	(23)
“分”	(31)
名句欣赏	
【上士之耳训乎德,下士之耳顺乎己】等五句	(56)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 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 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责任编辑:宋亚颖 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西安历史大词典》首发式暨研讨会举行

2012年12月10日下午,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策划组织,联合西安高校和科研院所几十名专家学者,历时多年共同编纂完成的《西安历史大词典》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市政府隆重举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关组成人员,西安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和学者等,共80多人参加。会议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周爱全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史南征、市政协副主席张建政出席会议,与省地方志办主任刘培仓等领导一起,向省书馆、市图书馆,省社科院图书馆、市社科院图书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和西安文理学院图书馆赠书。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介绍《西安历史大词典》编纂情况和西安地方志工作开展情况。她说,《西安历史大词典》是一套全面反映西安3000多年历史的大百科全书,一套四卷,分别为《汉代长安词典》《唐代长安词典》《明清西安词典》和《民国西安词典》。记述时限起于事物发端,终于新中国成立。以汉、唐、明清、民国为重点,涵盖西安整个历史,内容涉及西安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总字数400

余万,词条2万余条,图表600余幅。近年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加紧编纂二轮《西安市志》的同时,区县二轮修志工作也在有序开展,重修《户县志》已通过省终审,《碑林区志》于今年出版,全市二轮修志工作正在按照全省的要求,计划于2015年全面完成。一年一度的《西安年鉴》按期高质量出版,连续多年获得全国地方志系统和出版年鉴评比特等奖,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还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先后编纂出版了《西安60年图志》《为西安喝彩》《世园在西安》,校点了《西安府志》,年内还将出版展现汉唐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那时长安》、回顾西安自辛亥革命至今发展变化的《西安百年大事要览》、反映西安缓堵保畅工作的《缓堵保畅西安行》等书籍。记述西安村落变化发展的《西安村落记忆》和《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志》,具有广泛影响的宋敏求的《长安志》的校点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西北大学教授杨希仪,原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巡视员、地方志专家董健桥,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宋亚萍,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研究员夏泽民,先后从《西安历史大词典》

专家学者介绍和评价 《西安历史大词典》观点摘登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西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冯艳阳：记述地方历史，挖掘地方历史文化，是地方志机构的主要职能，也是我们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历史责任。《西安历史大词典》的编纂，正是基于挖掘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化，服务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目的。为此，2010年市志办与西北大学教授张永禄签订《汉代长安词典》《唐代长安词典》和《明清西安词典》修订再版协议，与民国史研究专家李云峰教授签订新编《民国西安词典》协议。在我办与相关专家学者的共同努

力下，于是才有了今天完整的《西安历史大词典》。

《西安历史大词典》的编纂出版，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编纂过程中，魏民洲书记和董军市长在百忙中欣然为系列丛书撰写了总序。

《西安历史大词典》的编纂出版，是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希望能为西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能为广大读者了解西安和研究西安提供重要参考

(接上页)内容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体例的独特性、条目设置的规范性，词典资料搜集的艰难性和编纂的繁杂性，以及该词典对西安历史文化研究、西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意义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研讨。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培仓充分肯定《西安历史大词典》的独创性以及对全省地方志工作的示范作用，希望西安市继续为全省带好头，促进地方志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周爱全最后总结说，《西安历史大词典》

作为西安历史文化挖掘和整理的重要工程，在西安文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其出版发行是向党的十八大最好的献礼，也是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提前向全市人民献上的新年贺礼！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可挖掘和整理的东西还很多，市地方志办公室应该充分利用西安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这一优势，搞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他最后指出，《西安历史大词典》是一个成功范例，其他部门要学习和借鉴这一做法，共同推动西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资料。

西北大学教授、《西安历史大词典》主编张永禄：《西安历史大词典》这部400多万字浩大学术工程的完成，是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向西安文化事业奉献的又一丰硕成果。该词典的编纂者多是长期从事长安都城史、秦汉史、隋唐史、宋史、明清史、近代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碑林史、考古学等研究的专家学者。

在编纂体例上，一改过去词书以笔画多少顺序排列，而以志书体编写。横分门类，每个门类中按时代先后记叙，即先横后纵（而史书体则是先纵后横）；一人一事一物列为一词，言简意赅，不分段，强调内在的逻辑关系；不作评论，客观纪实。对学术上有争议的，或诸说并存，或以一说为主，兼述他说（而史书体则作评论）。

《西安历史大词典》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叙了西安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悠久而又深厚的历史文化，为目前西安实施以历史文化遗址保护与合理利用为核心理念的“唐皇城”复兴计划，及建设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历史脉络和文化渊源方面提供了充足的历史依据。同时，也成为了解和查阅西安历史文化的一部重要的必备工具书。

西北大学教授、《西安历史大词典》主编李云峰：西安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极其丰厚的城市和地区。这种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除了根植于数千年农耕社会的古代传统文化之外，还应当包括近代以来（含清代晚期和民国

时期）在社会转型和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中形成的现代性新文化。两者都是构建当代西安文化和中华文化体系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然而，要以史志结合的形式编纂一部如实反映民国时期西安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全貌的词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度颇大。首先，与长期相对稳定的古代农耕社会不同，民国时期既是中西博弈、新旧递嬗、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和思想文化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如何看待民国时期（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主导的北京政府时期和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级政权及其所作所为，如何认识当年体制内的改革（即改良）和体制外的革命这两种社会变革思想和方式，如何理解国共两大政党的两次合作与分裂，如何评述当年处于时代潮头之上又取向各异的社会团体和历史人物，诸如此类重大而又众多的问题，至今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都需要继续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并加以澄清。其次，与古代相比，民国时期的人和事距离当代最近，联系更为直接，这固然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所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亦大，更何况当事者的后辈相当关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争议。这就要求编纂者必须思虑周详，一丝不苟，谨慎面对。再次，相对于作为京畿之地和首善之区的古代长安而言，民国时期的西安早已被边缘化、边缘化了，加

之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许多珍贵资料已散佚、损毁甚至湮没,缺乏系统、完整、成套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编纂者费尽心力所能搜集到的,也只有内部出版的寥寥数种容量有限的档案资料汇编和若干零星、残缺的档案,更多的则是地方志、回忆录、游记、考察报告和报刊资料,以及时人、今人的论著。而后者有不少主观色彩较浓,失实之处较多,必须重新进行审视和研究,经过“内证”和“外证”加以对比、分析和鉴别,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拿来利用。

《民国西安词典》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以科学发展观和唯物辩证史观为指针,摒弃传统的“成王败寇”史观和两极思维方式,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深化研究,尽可能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和记述民国时期的人和事,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不以成败论英雄”。第二,真实性原则,即戒除主观臆断和“假、大、空”,求真务实,不受流俗或外力干扰,一切以真凭实据为依归。这既关乎于历史学和方志学的生命,亦是辞书的灵魂所在。第三,宁缺毋滥原则,即对于某些当下找不到可靠依据或不易把握的词条,暂不入典,留待以后继续考察、探索和完善。第四,创新性原则,即注重吸收编纂者和学术界公认的最新科研成果,并在体例安排上打破常规,推陈出新。

西北大学教授杨希义:《西安历史大词典》的顺利出版,是西安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发利用文化和旅游产业中取得的又一项丰硕成果,也是西安人民在学习和

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活动中献上的一份厚礼。

《西安历史大词典》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

第一,利用词典形式表现和宣传西安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内容,是西安的一大创举,体现了西安在建设社会文化事业和开发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创新精神。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类似的书籍形式独此一家。

第二,词典承载西安历史文化的时间跨度是空前的,几乎囊括了从史前 80 万年前的蓝田猿人、距今 1 万年仰韶文化半坡遗址、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西周,直到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前上下 3000 多年的历史进程。

第三,从纵向上看,词典反映西安历史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囊括了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

第四,词典的资料异常丰富、翔实,包括了浩如烟海和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资料,近代以来考古文物界的发掘资料,还包括了前贤和当代学者对古都西安历史文化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该词典凝聚了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心血,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编审董健桥:《西安历史大词典》这套巨著,装帧典雅,印刷精美,风格统一,不但是地方史志研究的精品,也是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

《西安历史大词典》为学习研究千年古都、西北重镇西安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实用、便捷、权威的工具书。其特色鲜明，内容翔实，再现了西安历史的方方面面。总体来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历史跨度大，纵贯西安这块土地上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书中为蓝田猿人、半坡、姜寨先民都专列了条目，展现了文明初始阶段的基本状况。对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史，则更是叙述详尽，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直到民国，基本上做到了纵不断线。二是内容丰富全面。全书按照地方志体例，采取分类记述的方法。汉代卷分二十大类，唐代卷分十九大类，明清卷分十七大类，民国卷分九大类，类目之下又设诸多分目。所设类目、分目清晰，内涵明确，分类合理，涵盖了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宗教、建筑、文献、人物等等各个方面。三是整部词典知识含量高，浓缩了历代典籍的精华和近现代以来历史学、考古学新的科研成果。假如我们把词典全部引用的文献罗列出来，一定会是一部“书目大观”。四是记述严谨，考证严密，逻辑清晰，结论可信。西安历史悠久，有着 3000 多年的建城史和 1100 多年的建都史。历史变迁，沧海桑田；文献记载，众说纷纭。这就给编写一部经得起社会检验的权威工具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此，编写者采取了“对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或诸说并存，或以一说为主，兼述他说”的方法，为读者提供了更多

研究的线索和思考的余地。五是体例规范，便于使用。词典出自学养深厚的史学专家和地方志工作者之手，文风朴实，行文流畅，学术规范，观点明晰，加上文笔简洁，称得上字字珠玑。每部词典有《编辑说明》或《凡例》，使读者了解其编辑方法、内容特点。书前有词条分类目录，书后有按笔画索引的词条目录，检索、查阅十分方便，是一部实用的工具书。

《西安历史大词典》实际上开创了一种地方志编纂的新形式。词典在体例上采用条目体，而条目之间是互相并列、互不兼容、互不隶属的关系，一般是一事一条、一物一条、一人一条，只要把握住撰写对象的本质特点和基本属性，在写法上，可不必考虑开头结尾、穿靴戴帽、起承转合、论证发挥等做文章的手法。既是综合性的地方历史词典，又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便于查阅使用，可以成为各级领导、各行各业、青年学生、海内外各界人士认识西安更直接、更便捷、更实用的工具。

《西安历史大词典》作为一部 400 多万字的巨著，其中自然难免有个别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成果辉煌，令人鼓舞，是没有疑义的。

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宋亚萍：西安是一座具有灿烂辉煌历史的伟大城市，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有一千多年的建都史，有着丰富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一个城市的人民如果对自己的城市发展历史都不甚了解，那就更不上传承、发展这种历史文化了。基于此，西安市方志办策划编纂了《西安历史大词典》。本

套词典以工具书的形式，全面详尽地记录了西安的发展历史。该书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出版盛事。

《西安历史大词典》记述时间跨度长、资料覆盖面广、收集整理难度大。整个编校过程中，组织者、整理者、责任编辑、审校者密切配合，精益求精，市志办的相关领导全程参与，多次亲自下印刷厂跟踪质量。经过多方精诚合作，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西安历史大词典》，是一部难得的历史研究成果资料集成，它将为我们全面了解西安历史文化，传承发展西安历史文化，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提供最权威的资料参考。

西安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研究员夏泽民：《西安历史大词典》一套四册，两万余词条，400多万字，跨度几千年，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词典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自然地理等方方面面，既彰显了西安厚重的历史文化，又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词典的出版发行为继承西安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好事，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需要传承，但更需要归纳总结和提炼，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理性科学扬弃。在此基础上把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再创造，培育形成新的文明，这才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需要的有用的软实力。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培仓：《西安历史大词典》不仅是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取

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西安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件大事，更为全省地方志资源整理利用增添了新的内容。《西安历史大词典》以词条形式记述历史，以汉、唐、明清和民国四个西安历史上的重要节点为重点进行梳理，条理清晰，这是对词典传统模式的一次继承与超越。它也是迄今为止陕西编纂出版的第一部特大型历史专科词典。西安自古以来，东西方文明交汇，古今文化交融，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在这方面，西安市志办围绕西安文化强市建设，主动出击、谋事成事，做了大量的工作，成效显著。首次发行的《西安历史大词典》一书，正是西安市志办研究和挖掘西安历史文化的一次重要突破，也是西安市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它对于研究西安历史文化、民情风土、自然、社会科学、天文地理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体现了西安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塑造了大西安的城市精神和文化胸怀，也为西安的文化创新与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仁义村

仁义村位于南门外盘道东南角,紧邻环城路,有着近百年历史。是西安市商贸旅游的黄金地段,是彰显古城面貌的窗口,许多重要的迎宾接待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听村里老人们讲,在旧社会仁义村叫人头院,是因为当时这里许多人以捏泥人头为生,因此得名人头院。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合作社,人头院改名为仁义村。20世纪70年代,全村人口70多户,100多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仁义村也逐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经济收入在碑林区各村名列前茅,而且还是西安市首批小康示范村。

1992年,深圳华翔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5000多万元和仁义村联建唐人大厦,揭开了仁义村发展史上的新篇章。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增长,人均分配从20世纪80年代70多户100多人,年终人均分配500多元到2009

年106户240多人年终人均分配1.2万元。

集体资产由20世纪80年代初200多万元发展到2010年的6000多万元。在不断提高村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两委会先后拿出了大量资金,为村民办培训班,定期对村民进行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开展娱乐活动,组织大家出省旅游,参观考察学习各地经济建设发展。村里坚持开展评十星户、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活动。通过这些形式举措,有效提高了村民的精神文明和道德素质。每年春节前,两委会干部慰问村里老干部及村里80岁以上老寿星村民,给每户送春联,每人发放过节物品及年终每人分配分红。曾获得中共碑林区委碑林区政府颁发的“文明村”称号、“先进单位”称号,中共碑林区农村工作局委员会颁发的“先进党支部”、“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2006年6月30日零时,村民户口由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2007年10月初,仁义村全体村民响应政府号召,积极配合政府进行拆迁改造,开始为期三十个月的自行过渡。

2008年8月由碑林区民政局和农工局挂牌,仁义村村委会变更为仁义宏信社区居委会。2010年8月全体拆迁户回迁改造后的高层住宅楼。
(仁义宏信社区居委会)

南 关 村

南关村以西安市碑林区南关西后地(现城堡酒店南门广场西侧地址上)为核心,由于地理位置位于西安市大南门外、“南关”关内,所以起名南关村,20世纪50年代初,综合性高级合作社时期组建成立。2009年5月组建南关社区居委会,现有272户,669人。

高级合作社时期本村属于半蔬菜、半粮棉体制,可耕地面积约有200余亩(分布在现振兴东、西巷,小雁塔寺东、小雁塔寺西,建设西路,太白南路,木塔寨等区域)。当时约有30余户、400余人,骡子、马20匹,马车7辆,饲养室12间大瓦房。村民以种地为主,马车运输为辅,劳动日价值1元人民币。

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本村由一、二、三小队(组)组成,设有农业生产股、副业股、饲养股、技术股、文教卫生股、保管股、运输股。形成了以西安市碑林区永宁公社为主管上级的农业大村。

1959年后随着学生回村劳动,也给村上带来新的变化。建成了30余亩的蔬菜试验站,使蔬菜产量有了大幅度提升,特别是自行培植的大白菜、芹菜、萝卜,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组建了南关村面粉加工厂,为本村和邻村村民加工生活口粮,为本市各大食品厂进行原料加工(如:绿豆、江米、白糖、红糖、芥

麦、芝麻等)。1960年组建了南关村豆腐厂,将生产出来的豆腐送往西安市副食品蔬菜公司。1961年组建了每年可饲养繁殖100多头猪的养猪场,将成猪交往原西安市肉食品公司生猪收购站。1971年组建了南关机械加工厂,成立有2名经过专业培训的赤脚医生和建筑面积20平方米的南关医疗站。

20世纪70年代初,本村由原“半蔬菜、半粮棉”体制转变为全蔬菜体制,在体制上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村的村办企业和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79年本村组建了具有100余间客房、安排劳动力20多人的大型住宿旅社《南关旅社》,年收入约为人民币18万元。当年就收回了该旅社的全部投资。1980年,本村废弃了原南关机械厂,先后组建了大型停车场和规模较大的轻工业品展销馆,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改革开放思想进入本村,与本村村民的勤劳朴实融为一体。1981年在太白路组建了可安排劳动力20余人、每日可加工约12500公斤原粮的大型面粉加工场“南关面粉厂”,当年就收回该厂的全部投资,年经济收入约为20万元人民币。1984年,废弃南关旅社、停车场、工业品展销馆三个企业,与新加坡外商合资组

●我们的村落●

建了全国首家农村与外商合资的长安大酒店。1988年由于城堡酒店的组建,本村一部分村民的住宅地由南关西后地搬迁到小雁塔寺东(现友谊西路南关新村),1994年建造南门广场,将另一部分村民的住宅地拆迁到建设西路(现南关村建设路小区)。1971年由本村自编、自导、自演的忆苦思甜歌舞剧《收租院》到各区巡回演出。其间,还组建了具有绑芯子、踩高跷等规模最齐全、最宏大的南关社火队。每逢节日,进行社火表演。自发组织红、白喜事的理事会,20世纪90年代以前用非常古老、通俗的方式操办。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

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办喜事时,一般都在饭店、宾馆摆酒席答谢亲朋好友。在丧事方面遵守国家的政策和规定将土葬改为火葬。

2006年,根据市区文件精神,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清产核资时集体总产值4700余万元,其中土地估值1800余万元,集体经济转股份制的工作尚待进一步落实。2008年9月28日,经西安市碑林人民政府批准,南关村村民委员会建制改为南关社区居委会。

(南关社区居委会)

橡凹沟

◎ 孙兴盛

橡凹沟是蓝田县玉山镇峒峪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清朝和民国,一直叫橡凹沟,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社化时期,叫峒峪大队第七小队,玉山变成建制镇后,为峒峪村第七村民小组。

说是一个自然村,其实是峒峪村东、靠山根下被夹在三条梁两道沟之间星星点点的住户。大大小小十五处人家,蜗居在南北长一公里、东西宽半公里的皱褶里。50多户200多口人从清朝末年开,就在这沟沟道道里繁衍生息。大多千里迢迢从商州、洛南移民至此,分别居住在“碾子”、“阳坡”和“阴坡”。民国末年,蓝田县地图上明显地标出了“橡凹沟”这个村名。

为何叫橡凹沟?大约缘于两种传说:

西汉丞相萧何,为修建未央宫到处伐木,

然而合乎标准的木质坚硬的大型木料难求,于是溯灞河而上,到石门谷(今之倒勾峪)口,见不远处大树森森,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就把目标瞅在了峒峪村东边的山坡上。走近一看,几搂大的橡树一棵挨一棵,密密麻麻,布满了四五条山梁。一阵高兴,就此安营扎寨。大量的橡树被砍伐后,通过峒峪河、灞河漂流,一直运往咸阳。未央宫大部分木料来源于此。后来,人们把丞相曾经伐木的这几条山沟,称作“相凹沟”。

橡凹沟分大橡凹和小橡凹两部分。据说在明朝或者更远的年代,这儿所有的沟沟岔岔全是橡树,几乎没有别的树种。一棵挨一棵,密密麻麻,大的几个人搂抱不拢,小的也有脸盆那么粗,名副其实的橡树世界!于是,人们就把这七沟八梁周围三十多平方公里的

地方称作“橡凹沟”。到了清朝，橡凹沟山外边三梁两沟的阴坡、阳坡、坑坑洼洼、皱皱褶褶开始有人渐渐迁来居住，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村庄，村名也叫做“橡凹沟”。

木炭窑

明朝时期，橡凹沟还是大树参天，遮天蔽日。嘉靖年间一个叫孙永新的下苦人，住在霸龙庙，经常担着木炭翻山越岭到玉山集市出售。晚间就住宿在临近山口的峒峪村。那时候，峒峪村只住着庞姓和谷姓两大户族，他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个远路来的客人，除了热茶热饭招待，也和孙永新聊得热火朝天。后来就谈到烧木炭的原材料问题。孙永新告诉他们，木炭是用一种叫橡木的大树烧成的。庞姓人和谷姓人就领着他去村东的山坡观看。这一看，孙永新十分惊诧，就说，这全是橡树，用它烧木炭，一百年都烧不完！

孙永新不再去霸龙庙以肩挑木炭为生，他干脆把家搬来住在峒峪村，成为孙家始祖。孙家始祖利用他在窑场子学得的烧炭技术开始了新的谋生手段——烧木炭。

很快，孙家高祖成了“木炭专业户”，雇人砍树，雇人运输，雇人捶窑、烧窑，也雇人专业去销售，一个暴发户很快地诞生在峒峪村。那时的橡凹沟，一孔孔木炭窑密密麻麻塞满了大大小小的黄土坡。

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一直烧到清朝中期，橡凹沟的橡树被烧空了，到了民国初年，橡凹沟几乎没有橡树了。

传说后来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2007年，峒峪村村民朱常生向世人揭开了橡凹沟烧木炭这一历史之谜。一天，他去橡凹沟开垦荒

地，在靠近山坡的突兀处，一镢头挖下去，连人带工具陷进去了。等他回过神来，发现掉进一个深坑，坑周围全是木炭。他一根一根放在坑外边，闲下来仔细观察，发现古代的木炭比当今的木炭整整长了两倍还要多。现在的炭杠子一般长2.5尺，而他挖出来的炭杠子足足5尺多，按照一担炭100斤计算，他整整担了三担。也就是说古人一窑货只烧300斤左右。

木炭运回村子，招来众人围观。按照“千柴百炭”的说法计算了一下，当初烧炭的橡木，直径至少有80公分，从中间劈成四瓣，然后塞进窑里去烧。估计那时直径超过80公分的木料就不再用来烧木炭，而作为建房的屋梁或立柱了。

古树白鹤

橡凹沟阴坡有一棵千年皂角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白鹤冬去春来，飞翔在蓝田县城东川的上空，成为峒峪村八景之一。

据传说，唐朝初年，李世民命尉迟敬德监修水陆庵，殿宇所需木料全部采伐于橡凹沟。一日，敬德骑马来到橡凹沟阴坡，见橡树森森，遮天蔽日，当即下马坐石歇息，顺手将马鞭插在地上，眨眼工夫，鞭杆上却长出枝干，接着又生出叶蕾。正在惊奇，枝叶逐渐伸长，一顿饭功夫遂长成一棵碗口粗的皂角树。敬德知此地乃神奇之地，于是对着树干连连三拜。

这棵皂角树迄今已1300多年，仍枝叶繁密，生长茂盛。树干需五人合抱，树高三十多米，树冠覆盖四十多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不知从哪儿飞来许多白鹤。每年开春，数以万计的白鹤从南方飞来，落于树冠之上，直至落

满每一个枝枝杈杈。几十年来,白鹤栖息的这棵大树,被人们成为“白鹤树”。“白鹤树”成了蓝田县东乡一道人文景观,《西安通览》将其作为风物写进书中,县人民政府又在树下立碑警戒。

罗崖

沿着八爷沟上行,就到了一个叫“光土梁”的大梁上。这条梁是橡凹沟上沟和下沟的分水岭,从山根一直延伸到峒峪村的大河边。

顺着大梁向东北方向走去,则进入一个叫罗崖(当地人发“nai”音)的地方。罗崖没有姓罗的,却有两户姓王的,从民国时期一直住到公社化结束。

没一户姓罗的,为什么会叫罗崖?大部分人很不理解。其实,当你站在东边的高山头上,就会发现,罗崖这块地方四周高突,中间低洼,像旧时农家人罗面用的马尾罗。也许罗崖就因了此地像一个“罗”吧。

罗崖住两户人家,靠房屋西侧,有一片竹园,竹子大的有胳膊粗,细的也有蜡烛粗。当地人把这种竹子叫响竹,其根繁殖很快,三两年就把房屋周围串联在绿色掩映之中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罗崖的竹子在方圆几十里独一无二。

过去,玉山地区甚至方圆四五十里路以内,人们过年过节都要去罗崖的黄土坡挖白土。白土是地下蕴藏的一种非金属物质,白中泛蓝,人们叫它“白土”或“蓝土”,可以当作涂料粉刷墙壁,并会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新中国成立前后,每逢年关将至,远远近近的乡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挑了担笼,扛了锄头铁锨,一溜溜一串串蜂拥而至。从腊月初一开

始,直挖到腊月二十左右。

移民新村

橡凹沟的出行是一大难题。到庄稼地里去,走的是羊肠小道,收获稼穡,靠的是背扛肩挑;走亲戚赶集市,得担着行李上坡下硷,坑坑洼洼,艰难跋涉,一步一个小心;在集市上买一些生活日用品,很难送回家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拆了草棚盖瓦房,砖瓦运不回去,只能靠大家帮忙,一担一担向沟里边挑。后来也修了盘来盘去的简易土公路,但只能行驶手扶拖拉机,一次不过拉半车货。

2004年8月,在村两委会支持下,把上沟、下沟30多户村民迁移到峒峪村六组东边新建的“移民新村”;政府拿出三分之二资金,迁移户自筹三分之一,橡凹沟百分之九十九的住户,逐渐地搬出了深沟野洼,在移民新村盖起了排排漂亮的楼房。橡凹沟人和全国农村人一样,进城务工,有的人还当了小老板。原来弟兄们三四家蜗居在一个小院里苦度时光,今日全都分开另建新屋。现在的房屋总数,比在橡凹沟时多出了几十倍。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外交家 ——冯 嫫

“能史书，习事，尝持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这是《汉书·西域传》中对一位人物的描写。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她就是冯嫫，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女外交家。

汉武帝时，为集中力量打击匈奴侵扰，对西域的乌孙国采取和亲政策。公元前 101 年，以宗室女解忧为公主，嫁给乌孙王军须靡，公主出嫁时带上了侍女冯嫫同去乌孙。冯嫫生性聪慧，知书达理，与公主相互慰勉，完成了

一名随行侍者的职责。与此同时，她立志安居乌孙，不负汉朝使命。在乌孙国，她经常有意识地骑马去各个牧场，出入毡帐，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几年时间下来，不仅了解了乌孙国各方面的情况，而且还通晓了西域的语言文字及风俗习惯。

此后几年，冯嫫遵汉朝廷之命，以使节身份代表公主访问乌孙国的邻国。向各国国王赠送礼品，宣扬汉朝教化。由于其女性的特殊身份，加之大方谦恭，善于辞令，与各国人交谈时应对自如。所以深得西域各国人认可，被尊称为冯夫人。

乌孙国右大将爱冯嫫多才多艺，聪慧漂亮，求为妻室。冯嫫从两国友好大局出发，欣然同意。从此以后，汉朝与乌孙国友情日增。到了汉宣帝执政之际，乌孙发生内乱。朝廷原本想让翁归靡外甥元贵靡继承王位，不料北山大将乌就屠杀死国王泥靡，自立为王。宣帝得信后，急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率一万五千兵马进驻敦煌，准备讨伐乌就屠。西域都护郑吉考虑到汉军远道而至，兵马疲劳，若仓促对阵，则胜负难料。于是建议朝廷派使节与乌就屠谈判，劝其让位。郑吉知道冯嫫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积

●历代名人与西安●

极推荐由冯嫫担当这一重任。出于对汉朝和乌孙国的双方利益的考虑，冯嫫欣然接受了任务。

由于长时间在乌孙国生活，处于上层社会，接触面又广，这也为下一步的规劝打下了基础。于是冯嫫到北山面见乌就屠，向他晓之以理，陈说利害；加上汉朝大军的威慑和国内人民的反对，乌就屠不得不开始转变，请冯嫫从中斡旋，并希望汉朝加给他一个封号。后经协议，初步同意立元贵靡为乌孙大昆弥（大王），立乌就屠为乌孙小昆弥（小王）。

汉宣帝了解这件事之后，十分高兴，他对冯嫫也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于是诏令冯嫫回国。冯嫫回到阔别四十年的故都长安时，宣帝令文武百僚在城郊迎接。京畿百姓闻讯，不期而集，争睹女使者的风采，人山人海，道路堵塞。当日，宣帝在宫中召见，冯嫫奏告了劝导乌就屠经过，建议给予封号以安其心。宣帝盛赞其远见卓识，欣然采纳，并封她为正使，竺次、甘延寿为副使，再次出使乌孙。

冯嫫驷马锦车，手持汉节，召乌就屠至赤谷城中，宣读诏书，封元贵靡为大昆弥（王号），乌就屠为小昆弥。依靠其奔走斡旋，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消除了汉与乌孙的一场杀伐！

“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遣之，卒百人送焉”。甘露三年（公元前 51），元贵靡病故，其子星靡即位。生性懦弱，治国无方，局势又起动荡。此时的解忧公主年近七十，奏请朝廷准允后，带着冯嫫一同返回长安。面对乌孙的形势，冯嫫身在长安，心挂乌孙，于是上书宣帝

请求再次出使乌孙。初元元年（公元前 48），宣帝准奏，选派骑兵 100 多人护送冯嫫第三次出使乌孙。

冯嫫以她的威望与才干，游说乌孙各方消释嫌隙，精诚团结，帮助星靡治国安民，乌孙得以国泰民安，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也因此得以继续。

冯嫫的声望和信誉，不仅沐浴着乌孙，其孜孜不倦地维护团结安定，开创和平局面的言论和行动，也博得了西域诸国的尊敬和爱戴。正因如此，西汉王朝曾经命她以解忧公主的身份，作为钦差大使，持汉旌节，驾锦车，遍访天山以南城郭诸国。

当时，她已年过半百，不辞辛苦地翻雪山，越大漠，历严冬，踏酷暑，走访了三十多个城郭之国。每到一处，都受到上上下下隆重而热情的礼遇。为各国排内忧，解外患，讲礼仪，说道德，扬善抑恶，推心置腹，使汉朝恩义广布大小绿洲。因而，城郭诸国都尊称她为“冯夫人”。她的出访，对于增进城郭诸国对汉朝的了解，促进西域都护府的建立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冯嫫，这位西汉女杰，多次被朝廷任命为正式使节，出使异邦，这种情况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她为了加强汉族与西域少数民族的团结，可以说贡献了毕生精力，在民族团结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纵观古代史书，书写女性人物的文字本就不多，《汉书》却以较多的文字记述冯嫫，足以说明她在汉与西域诸国，尤其是与乌孙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试论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

◎ 张世民

一

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是地方志工作者对于地方志学术话语自身的自觉反省的标志。这种自觉反省有双重取向：一重是批判性的，即要求检讨传统地方志著述的话语方式；一重是建设性的，亦即要求重新建构适应时代发展的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道路，便曾经历了从传统学术话语中脱颖而出，重新建构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的全过程。

建立健全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对于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地方志学术话语并非亘古不变，而是不断扬弃、不断演变的。从古老的地记、图经到今天的地方志书，乃至其他区域性著述，其发展轨迹均意味着地方志学术话语的不断调适、不断完善，并臻于有意味的、完美的形式。最早的邦国之志，当以对区域地理、风土的点睛认识为前提；其次，是将人物、事件等掺入其中。随着地理—历史认识的交替深化，事件、人物、地望、掌故、风土等等，逐渐成为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主体内涵。地理—历史主体内涵的交相增益，互动交流，构成了区域研究与人文彰显两方面的话语优长。譬如：在视觉方式上，强调区域特色而非全球视角，构成了地方志学术

话语体系的基本的学术自律；在话语方式上，强调具体叙事而非抽象论理，成为了地方志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的语言诉求；在分类方式上，强调平分门类而非逻辑分析，更演变成地方志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的认识架构。

近代以来，在方志学学术话语的转变方面，有一个不断递进、不断拓展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民族、民权、民生概念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科学、民主、共和思维日益深入人心，传统道德学术话语渐渐让位于近代政治学术话语。尤其是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抗日战争时期，方志学学术话语逐渐走出自闭，走向现代，从传统叙事话语转向当代审视话语，从狭隘的区域定位走向广阔的民族国家定位，从过去的平分门类走向近代的逻辑分类，这种学术话语方式的转变使方志学科化更加明晰，某些普适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逐渐超越于特殊性之上。

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传统地方志本身就是饶具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学术话语，它的学科建构与话语转变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特色表现之一。在当代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思潮中，先后涌现出两种对立的学术倾向：一方面，地方志所代表的当代学术话语的一部分是独立的、可操作的；另一方面，某些地方志书却剑走偏锋，踏上了一条自我荒废、自我扬弃的不归之路。今天我们强调

●学术交流●

重建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对于地方志学术话语近代化过程的反思,进而梳理出当代方志学学科的发展方向,使之更加趋近社会现实,更加直面社会问题,更加映现社会真相,以彰显其广泛、深刻、持久而活泼的学术话语能力。

二

当代地方志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首先要植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话语基础之上。所谓当代性,其实是个相对的概念。当代性随着社会属性的人的自然消长和话语内容的自然转移而不断发生变化。我们所要植根的当代社会现实的话语基础,并非基于审美的、反思性的传统世界,而是富有切身感、现实性的经验世界。从经验世界到传统世界,两者学术转变的关键乃在于理性提升和逻辑分析。我们在使用具有较强切身感的当代学术话语时,就不可搬用那些僵化的、死亡的语言,更不要使用人们无法通晓的、佶屈聱牙的小众语言。当然,这种当代学术话语的基础,其实在于使用社会共享的、通用的大众语言。那些试图超越现实社会、不受条件限制的语言基础是不存在的。

其次,是要立足于特定的民族语言或区域语言的基础之上。地方志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学术话语载体,因而善于运用汉藏语系中不同的民族话语,正确把握方言内蕴,也可成为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语言基础。随着民族的复兴和区域的发展,民族、区域话语的崛起和当代语范的理性重构,以及区域言语同外部世界的互动交流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从清代学者章学诚到近代学者梁启超,两人在方志学学科近代化过程中的贡献,正在于让地方志书这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术载

体,开始了独立言说、自讲自话,具有特定畛域、特殊话语方式的一门学科。

第三,是要植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方志学科较之历史学科而言,其切身感和现实性更加切真。只有区域社会形成了自在环境并蔚成独立精神之时,那种生动活泼的、真正的学术话语才成为可能,扎根于这种鲜活语言之中的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方始生成、发育并繁盛起来。那些用空洞的论理模型来构建区域社会发展图景的学术意图,必将在不断演变、不断更新的学术话语体系中黯然失色。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的现实基础,正是对于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概括。

地方志书必须着眼于现实,重视地情提炼、地情概括,从而梳理出有关区域历史和发展现状的基础舆情。

为此,要建立崭新的方志学学科话语体系,就必须深化对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在话语基础、话语语态和话语方式等方面有所创新,有所拓展。

三

回顾、总结、反思与研究近代方志学的历史演变,我们不得不强调地理—历史与社会学对于方志学的历史作用,更不得不强调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对于这一学科的现实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方志学出身于传统的地理—历史学科,所以传统地理—历史学科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而近代西方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又促使其从传统地理—历史学话语体系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志著述同时又是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公共载体之一,这一学科必将成为特定时期政治—

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然延伸。所以哲学—政治与经济学作为当代学术观念，对于方志学的逆向渗透与学术导引也不可低估。

还应当指出，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理念，因而基于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基础，一个时代的学术实践也会有相应的社会观念来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定的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体系的建立或引进与运用，以及关于社会现实的解读、语言表述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点等等，都是建立这一时期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诉求。所谓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恐怕不仅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而且构成了需要实际操作和运用的现实命题。

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20世纪初期以来，地方志的学科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末，是认同、延伸和再造传统学术话语的时期。这一时期处于传统道德话语向近代政治话语转换的历史关头，其基本特点是在继承平列分目的体的同时，逐渐涌现出具有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特点的逻辑分类观念。近代方志学作为特定区域社会现实和学术语范的理性反映，在社会现实的激荡演变中仍然守望着传统道德话语体系，对于新兴的政治话语体系处于一种半拒斥、半迁就的依违状态。譬如民国中期《重修咸阳县志》中，县志监修、县长刘安国等人就开始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性渗透，从而在社会现象的认知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一种新颖的现代学术话语的形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第二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更新、重塑和接受当代学术话语的时期。这一时期，当代政治话语倾向日臻极端

化，政治话语对于学术研究的强势干预，促使方志学学术话语处于完全虚无化、庸俗化的境地。这一时期，方志学与地方志编纂事业均遭遇了严峻的人为割裂，其中既有来自清醒而严肃的科学解析，又有狂热病态的政治干预。在篇目设计、内容取舍、思想内涵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表现出用近代政治理念来改造地方志记载模式的倾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对于历史记载极端畏惧与强行扭曲的倾向，即其显例。事后看来，由于思想的偏颇性和话语的极端性充斥其中，所编地方志著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要大打折扣。

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是整合、融冶和刷新方志学学科话语的时期。这一时期正处于当代政治话语渐臻平淡，相对独立的学术话语得到揄扬的阶段。人们在思想—政治领域内，开展了空前的思想解放和政治重建，促使这一时期的学术话语在映照社会现实方面走上了清新活泼、灵动活用的轨道，重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找到了更宽广、更理性、更可信的行业话语方式。尽管这一时期地方志编纂实践仍颇具波澜，表述上的套话、空话和废话仍相当普遍，但这一时代改革开放与震荡、平复交互发展的倾向，还是促使地方志著述的学术性和现实性有了进一步加强。

上述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当代哲学意义上的“正”、“反”、“合”的逻辑认知过程。方志学在上述三个阶段，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气象和演变轨迹，对此加以科学的回顾、总结、反思与研究，正是我们重新建构当代方志学学科话语体系必须去做的工作，也是当代方志学走上自我审视、自我重塑的必要路径。

(未完待续)



怀念西安人民的好市长 ——张铁民

20世纪80年代，古都西安，出了个鬼怕人爱的传奇市长。

此人姓张名铁民，山西介休人士，1936年参加革命，是个老牌子的中国布尔什维克。

张铁民几十年官场生涯，历风经雨，毫无例外地也曾被历次政治运动修理过。但他秉性难改，不怕鬼，不信邪，办事只为老百姓，而且极端认真，说了就算，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顽固透顶。缘此，市民送他大号“铁市长”。

从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角度看，西安是老大，北京都得排在它后面，更别说上海了。但是从现代文明角度看，西安却要排在许多

城市的后面。据此，铁市长的为政之道有两条，一是治人，二是治城。

张铁民对我说，他曾念过高中，因此当年在革命队伍里，他还算个知识分子，牛过那么几天。现在牛不起来了，大学生比比皆是，自己就成了文盲。他说，他这个市长，也就只能干点修桥补路、打扫卫生、管管人、替市民办点好事的活了。

他上任的时候，西安几乎是全国最脏最乱最差的城市，风吹垃圾飞，下雨污水流；有人在马路上筛沙子堆土和稀泥，胡乱堆放建筑材料；警察在大街上随便拦车捎脚，甚至

强令人家给他运东西；流氓横行，小偷出没，社会治安极差。西安是全国第二大旅游城市，也是国家的门面城市，如此脏乱差，岂不丢“国脸”？

我们看看张铁民是怎样整治古城西安的。

张铁民的办法很简单，先让人打扫卫生。他下令所有单位和个人要“自扫门前雪”，而且要求不能“一扫而过”，必须犄角旮旯都弄干净。住在钟楼附近的一位姓王的老太太对我说，她每天都要用筷子抠门前砖缝里的垃圾，抠干净后还要用水来冲洗。她说，铁市长这老头子可认真呢，他经常到大街上转悠，我可不敢马虎。

有一个中央驻西安的单位，院子很大，但却在墙外马路牙子上堆了许多建筑材料，弄得行人必须绕到马路上走。铁市长让人通知这个单位限期搬走这些建筑材料，但通知了两次这个单位都不理。铁市长想，你仗着自己是中央单位，就可以在我的地盘上霸道，我给你来个恶治，看你还牛不牛。他下令供水供电和供粮部门，掐断对这个单位的供应。铁市长对我说：“我这招虽然损了一点，但我们这个国家还处在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的时期，有些人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只停了他们半天的水电供应，他们就乖乖地就范了。”

有一位离休的老红军，是个将军，住在居民区的一个独门独院小楼上，自成一统。这位将军养了一条狗，经常跑到大街上乱窜，附近的居民敢怒不敢言。铁市长让人通知这位将军把狗拴起来，但这位将军不理，铁市长就让

人把狗给打死了，气得将军直跳脚。

我问铁市长：“你这么干，就不怕人家往中央告你吗？”

“不怕。”他说，“他们也告过我，但因为他们没理，北京对他们说要尊重地方领导。”

铁市长对我说，当官就要管事，管事就要先管人，而管人最重要的是先要管好自己的人。他说，干部犯法的比例，是老百姓的一百倍还要多。领社会风气之先者，是干部，特别是干部中当官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比如交通警察，”他说，“他们的岗位在大街上，职责是疏通道路，为司机和行人服务。他们往大街上一站，就应当是群众的标杆，是市委市政府的形象。但他们当中有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拦人家的车坐，甚至强令人家给他拉东西。这样的警察，我是有一个关一个，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放人。有的要被清除出警察队伍，不能让这样的人败坏警察的形象。”他说，他关交通警察的禁闭室，每天平均有40来个人在里边检查反省。

对于干部，他是有错必纠，有过必惩。对于那些受贿替别人违法办事的干部，他除了给予处罚之外，还要给行贿者送一纸通知，讲明是“因为你的原因才害得人家犯了法”。

凡是他说了的事，无人敢怠慢。比如，今天他布置了一项工作，过3天他就问主管的领导办得怎么样，此后差不多天天追问你，直到办好为止。一位当地的干部给我说：“老头子难缠着哩，让他盯上就没完，但我们又很喜欢他，他没有坏心眼。”

他对自己要求就更严格了，可以说一尘

●人物春秋●

不染。他儿子住在郊区,有人给他把房子换到了城里,他知道后又让儿子搬回去;他儿媳妇是个清洁工,打扫厕所的,想换个工作,他不让。他对家里人说,我在台上一天,你们就别想沾我半点光,因为我是市长。

我们常说水至清则无鱼,但铁市长周围“鱼”却挺多,因为他关心别人,特别是关心部下和老百姓。

那年头工资都很低,最低的干部一个月才拿20多元钱。虽然说那时候东西便宜,但绝大多数家庭也仅能维持最低生活。在这种大家都可怜兮兮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机关单位那些聪明的领导们,都想设法给自己的干部群众搞点福利,也就是买点鸡鸭鱼肉、蔬菜果品之类的分给大家。这些东西当年每个人也就合几元钱,但在那时几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

开始,市政府谁也不敢在铁市长面前提给大家搞点福利的事,后来他听到一些背后的议论,就给自己的秘书胡太平说:“咱们也给大家买点东西发发,要用机关的福利费,出了事由我来做检讨,与大家无关。但是有一条,我自己不要,因为我的工资比大家都高。”胡太平给我讲述这件事时,眼圈都红了。

这里顺便说一句,铁市长当年的这位秘书胡太平,后来官至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最近又听说做了陕西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官声一直不错。我想,胡太平的好官声,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得之于铁市长的真传。

书归正传。有一天,市政府门口来了个老汉,手里提着一口铁锅,说要找铁市长。

忠实的门卫不让老汉进去,老汉就在门口嚷嚷起来。

这件事惊动了铁市长,他来到门口对老汉说:“我就是市长,你有什么事。”

“我今天买了这口锅,”老汉说,“回家做饭,漏水,我去退,商店不给退,你说怎么办?”

“好办,”铁市长说,“我领你去退。”

铁市长领着老汉到了那家商店,当然还跟着秘书和司机了。那家商店的领导见铁市长来了,自然不敢怠慢,连忙要给老汉换锅。铁市长却说别忙,问了他锅厂的地址,然后说:“以后你卖锅,应当先倒上水放一天,看着不漏再卖,这是卖锅的老规矩。咱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全心全意。这锅不在你这里换了,我领老汉去锅厂换。”

铁市长一行几人来到锅厂,不仅给老汉换了一口不漏的锅,还把锅厂的领导教育了一番。

这就是铁市长,铁了心地为人民服务。

那时候民风还比较淳朴,因为铁市长管得有理,人气越来越旺。那些被他管过的人,对他也没什么怨气,口服心服。但是,奇怪的倒是有些当官的反而不高兴。

“有一次去看演出,”铁市长说,“领导比我先到剧场,但没人给他鼓掌。但是,我一进剧场,就招来满堂的喝彩,弄得这位领导很尴尬,一脸不高兴。我上去给他打招呼,他阴阳怪气地说我的脸比他的大,然后就不理我了。”

他讲完这件事后,评论说:“在官场上,同

僚之间有嫉妒心，虽说不应该，但还情有可原，惟独上级嫉妒下级，既无聊，又无知，实在是官场一大耻辱。”他说，“我不怕这些，再说我的官也到头了，人也要退了，只要老百姓日后提起我，说我这个市长还可以就行了。”

张铁民在西安不但留下了好口碑，还留下了一座古城丰碑。现在的西安古城墙，之所以那么完整，那么宏伟，就因为张铁民对它进行了重修。这件事是由他一手操办的，费了他不少心血。

在修城墙的那些日子，也正是我采访他的日子。在工地上，那些砖瓦泥水匠们对我

说：“铁市长是个好人啊！你一定要写他一笔，让后人知道这城墙是他重修的。”

又过了几年，我在北京听说铁市长去世了，难过了好一阵子。听说给他开追悼会那一天，牵动了西安全市城乡老百姓的心。郊区农村有个老太太，端着一碗小麦，上面插一炷香，长途跋涉徒步给铁市长去送行。有人下令各单位限人数派代表去参加追悼会，不准多去人。但这条禁令禁不住老百姓的心，追悼会上人山人海。

张铁民是个真正的人，伟大的人，他给自己树了一座无人能推倒的“心碑”，流芳百世。

·解字·

①

②

③

④

“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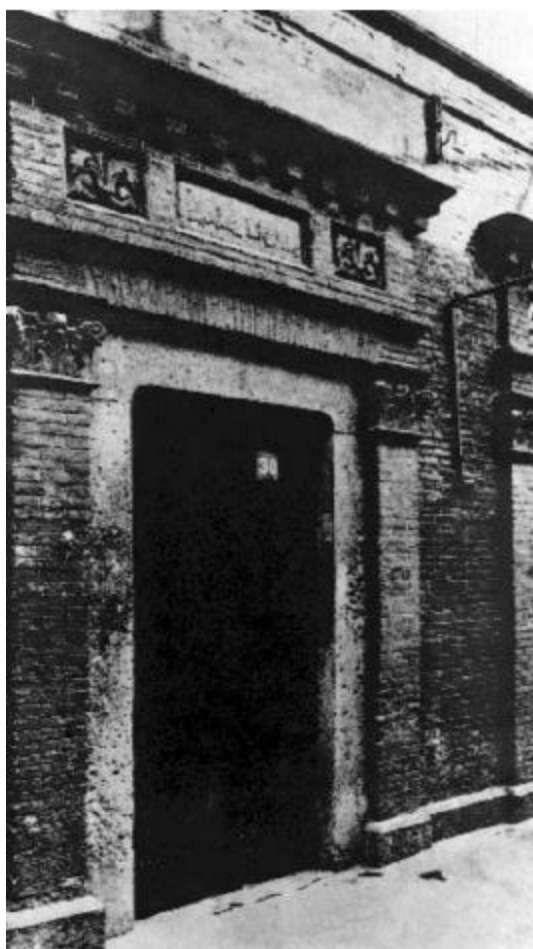
这个“小”字也是个会意字。甲骨文①的当中是一块细长之物，其两侧是一个“八”字，就是分的意思。一物分为二物，当然就比原物小了。②是金文的形体，其义仍同于甲骨文。小篆③是由甲骨文变来的，其“分”义更为明显。④是楷书的写法。

“小”的本义与“大”相反。这个词义极易理解，但是在古书中由“小”字所组成的词我们可要认真对待，稍不注意就会搞错。比如“小年”一词，一般是指“幼年”。至于“惠(螽)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庄子·逍遥游》），这里面的“小年”若解为“幼年”，那就错了，应当解为“寿命短促”。原话的意思是：螽蛄连春秋都不知道，因为它的寿命太短促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



破坏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博弈内幕

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从在北京机场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一直到上海虹桥机场为他们送行，我有幸参加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谈判在中国的所有活动，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慨无限。

尽管中国政府事前通过日本公明党、社会党以及自民党一些国会议员做了很多工作，田中角荣走下飞机的时候还是很紧张，态度也显得生硬。他见到在飞机舷梯旁迎接的周恩来总理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田中角荣，54岁就当上了日本首相”，接着又重复了一遍。

周恩来总理把田中角荣一直送到钓鱼台国宾馆条件最好的18号楼。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到了18号楼后，周总理要脱掉风衣，这时，田中角荣抢在我们前面，主动上去帮总理脱风衣。总理说：“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来替我脱风衣呢？”田中角荣则说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你把我安排在国宾馆18号楼，这几天我就是这里的主人了。那你就是我最尊贵的客人，我应该为客人服务。请允许我帮你把风衣脱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此期间，田中角荣又说了一句：“我54岁当上了日本首相”。我想，他肯定对自己54岁当上日本首相感到特别自豪。看看日本战后的历史，就知道日本的确没有这样年轻的首相，也没有这样中专毕业的穷苦人出身的首相。周总理好像不愿意再听这话了，笑着说，“田中先生，我51岁就当了中国总理，而且一直当到现在”。从此，田中角荣就不再强调自己54岁当首相的事情了。

接下来几天是谈判，这些谈判没有一次是完全按照对方意见办的。9月25日，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角荣在致答谢词时首先感谢周总理，感谢中国这么多朋友

接下来几天是谈判，这些谈判没有一次是完全按照对方意见办的。9月25日，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角荣在致答谢词时首先感谢周总理，感谢中国这么多朋友

●史料钩沉●

来欢迎他。紧接着,他说他代表日本政府对过去给中国人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据说,此言一出,立刻横扫宴会席间的“友好”气氛,姬鹏飞外长看到“中方所有出席者都愤怒起来”)。第二天,在首脑会谈中周总理对日方的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郑重提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说“添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反感。

9月27日,为解决有关表述问题,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与中国外长姬鹏飞在去长城的路上举行了一场“车中会谈”,我负责做翻译。当时,北京市内到八达岭的公路很差,一路颠簸,我还晕车。会谈中,姬鹏飞提出“反省”和“麻烦”都过于轻描淡写。大平正芳说:“我们两人同岁,现在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奋斗,为自己的国家努力。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们是没办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方面的意见写入《联合声明》里面,不要说谈不成,回去以后也很难交代的,我和田中角荣都得下台。我们如果下台了,也就没有人能够来执行这个《联合声明》了”。

大平正芳还说,“明确地讲,我本人赞成中国方面的观点,那场战争是明明白白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本人从大藏省出来以后,分三次到中国张家口附近做社会调查。那个时候,正是那场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亲眼看到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其实,那个时候田中角荣也被征兵了,他到了中国的牡丹江。但是,他没有拿过枪,只是在步军医院里面服役。他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和我是一样的……”

我记得姬鹏飞回来以后马上向周恩来报

告。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是必须解决的,因为第二天上午就要签署《联合声明》(当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田中角荣等人时再次问及“‘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田中说:“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那天深夜2时,参加谈判的人都靠喝咖啡提精神,大平正芳拿出一张字条来,那字条的形状我还记得。他说:“姬鹏飞外长,这是我们日本方面的最后方案。如果你们中方还是接受不了,还是不行的话,我和田中先生就只好打包裹回家了。”那字条上面用日语写着“日本国政府对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后来,中日《联合声明》里采用的就是这个表述。

我记得当时有同志认为不能同意,因为没有“侵略战争”四个字。最后周总理说:“既然他们承认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也痛感责任,他们要深刻反省,这不就是承认‘侵略战争’吗?为什么一定要加这几个字呢?现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们有困难,我们不应该为难这些准备解决问题的朋友们”。那时,尽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在外交方面还是有绝对权威的,他说话以后,就没有人争论了。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被「冷落」内幕



乘兴而去对苏赞誉有加

1921年，一批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是公开的秘密。此时蒋介石正值而立之年，踌躇满志，也是向往俄国者之一。孙中山早就知道蒋“有志西图”，1923年夏季组建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时便选择了他为团长，孙认为蒋具备成为一个优秀军事领袖的素质，定将“蔚为大气”。代表团一行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太雷，1921年他已经在苏俄工作过，有倾向共产党的沈定一（玄庐），以及王登云。孙中山介绍蒋介石的使命说，派他到莫斯科是为了探讨在北京西北及京畿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

蒋介石一行兴致极高，苏方

安排代表团一行9月16日参观第144步兵团，蒋介石在该团品尝了战士们的膳食，仔细观看了营房中的一切，他向该团官兵表达了自己深刻的感受：军民团结是红军强大的真正原因。

代表团还考察和参观了其他军事单位和工厂农村，蒋介石眼界大开，印象颇深的是：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将领及士兵……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智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当蒋介石在彼得格勒试乘旅行飞机，高高地“滑翔天际如在陆地”时，他可谓折服于苏俄军队实力了：“俄国武器之研

●史料钩沉●

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发，非我国之窳败也。”后来国共两党的军队都借鉴了苏联的政委制模式来建立党军。

热情跌落怒不可遏

在莫斯科期间，蒋介石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国民党代表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于其中表明中国的“国民革命将具有世界性质”，因为中国也要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中俄两国应当在这场斗争中携手合作。乍看起来，“世界革命”对于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动听的语汇，但是《代表团意见书》却“遇冷”——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苏方任何回应。有材料说蒋介石一度感到莫斯科“全藐视他”而大发雷霆。

蒋介石怒不可遏的原因之一，是在外蒙古问题上清晰地悟出了苏联对外蒙古的真实意图——使之脱离中国。

蒋介石依然怒不可遏，原因之三，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演说中表述了对孙中山的敬佩，因而受到代表团里“中国青年”的指责，这显然指张太雷对蒋介石演说持有的非议。原来蒋介石对中共旅莫共产党学员讲话时表露了敬佩孙中山之意，张认为蒋对孙“有崇拜个人之弊”。如果联系中国代表团一行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在 11 月 25 日会议上关于中国政治口号应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那场讨论，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部分采纳了蒋介石关于三民主义的意见等，可以理解，血气方刚的张太雷显然把苏式共产主义视为“最高”目标而不无“藐视”蒋介石之意，蒋则因张等“中国青年自大之心及其愿

受外人支配，而不知尊重祖国、领袖”，甚为国民党前途感到担心。

败兴而归萌生仇苏情绪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不无收获，《代表团意见书》未得彼方完全支持，因苏联不愿意国民党在临近其边境的外蒙古建军，但是国民党军政干部的培养工作毕竟已有端倪，双方决定或由国民党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或在中国帮助国民党党军的建设。苏联政府决定给予国民党以物质和人员的援助。蒋介石后来当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为他日后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迈出重要的一步。

蒋介石 1923 年底回国后给孙中山写了一个报告，1924 年又致函廖仲恺，向其表达对某些留俄的中共党员的不满，称他们“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的情绪，“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说这些人“但骂他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为一俄奴矣”。蒋并进一步认为，“俄党对于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言信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他劝告被共产国际视为左派的廖仲恺“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兴趣也”。

最终蒋介石没有保住外蒙古，斯大林视其为苏联的屏障，帮助它在 1946 年取得独立。固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它既令人扼腕又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

当年美军为何没有烧毁靖国神社？

当年美军为何没有烧毁靖国神社，据说是麦克阿瑟征询了罗马天主教教廷驻日代表比特神父的意见后，中止了烧毁靖国神社的计划。然而比特神父仅靠一人之力就能保住靖国神社么？

部分美军将领主张烧毁靖国神社，从精神上彻底解除日本武装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悍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在一次次战斗中，美国人亲自“领略”了日军拼死顽抗的“战斗精神”，他们不太明白日军为何在战场上不惧死亡？于是，美国开始研究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1945年，美国陆军部下令拍摄了一部名为《认识你的敌人日本》的影片。影片中解说道：“天皇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最神圣的神，他一人独掌政治、宗教大权。日本人相信战死之后灵魂可以被供奉于靖国神社，对于日本人，最高的荣誉就是战死后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因为连天皇也会去俯首参拜，所以日本人与其投降不如选择战死。”可以说，战前的靖国神社实际上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用以愚弄和笼络国民，煽动他们效忠天皇并甘心充当炮灰的御用工具。

美国国立公文馆保存着一份1944年的美国国务院“战后计划委员会”的机密档案。档案中写道，“靖国神社等神社并非我们所认

为的宗教。它们崇拜军国主义分子，培育了攻击性的国家主义精神，这样的神社违反信教自由，应当关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0日下午两点，美军将领麦克阿瑟乘坐的“巴丹”号座机抵达东京郊外的厚木机场。在鼓乐声中，麦克阿瑟志得意满，叼着玉米棒芯烟斗走下舷梯，他将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7500万日本人的绝对主宰者开始统治日本。此时的麦克阿瑟对日本军国主义恨之入骨，他一到任就下令解除日本武装，逮捕战犯。随后，美国公布了“战后初期对日政策”，表明美军将在日本实施宗教信仰自由，并禁止日本人打着宗教的旗号，搞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组织及运动，矛头直指靖国神社。

紧接着，美国国务院也公开宣布了废止日本国家神道，全面压制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方针。美国政府、宗教界等就靖国神社的处置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有的认为应该变成“国营纪念碑”，有的主张改为“无宗教色彩的追悼设施”等等。然而在驻日美军军官们眼中，这实在是太便宜日本人了。一些美军将领，尤其是盟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盟总)对敌谍报部的军官们，强烈建议麦克阿瑟放一把大火烧毁靖国神社，从精神上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这个建议打动了麦克阿瑟，很快，100

●史料钩沉●

名美国大兵开进了靖国神社。

为蒙混过关，日本人把靖国神社伪装成娱乐一条街

美军的行动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陷入了极度惊慌，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前首相东条英机的密令，称“靖国神社要永久存续，天皇亦理应参拜”。随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展开了积极活动，企图维护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权宫司(负责人)横井时常考虑到，因为人们都认为靖国神社是战争的中心，原封不动保留是不可能的。于是，横井想出一个花招，他决定利用盟总尊重信教自由的政策，以纯宗教的姿态维护靖国神社。1945年11月26日，横井亲自拜访盟总宗教科科长巴斯，提出了靖国神社由国家神社变为宗教庙宇的方案，至于名字则无所谓，改称庙也好，宫也罢，或者干脆改称靖国庙宫。为诱使盟总接受该方案，横井甚至提出，可以考虑将靖国神社一带变成以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娱乐一条街，设立剧场音乐厅、美术馆等。此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煽动由战争遗孤组成遗族会向盟总递交请愿书，希望盟总保留靖国神社。横井的障眼法最终骗过了巴斯，巴斯对横井的方案大加赞赏，并提交给了麦克阿瑟。

就在横井等人积极游说盟总的同时，日本陆海军省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靖国神社临时大祭，为死掉的日本侵略军招魂。尽管此事遭到一些美军军官的强烈反对，但由于当时围绕靖国神社的处理问题，盟总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决定允许日本人举行大祭，并视大祭的情况来决定如何处置靖国神社。

1945年11月20日，在盟总的监视下，靖国神社举行了大祭，这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由国家主持的大祭。裕仁天皇和币原(喜重郎)首相为首的政府各级官员以及日军代表参加了大祭，参拜者人数达到3万人。为了给盟总留下良好的印象，军人们穿着西服入列参拜……

日本人的伪装终于有了收获，1945年12月15日，盟总发布了麦克阿瑟第448号指令，即所谓的“神道指令”，宣布废止国家神道，实行政教分离。但这道命令却同意靖国神社脱离国家管理成为宗教法人，并与其他宗教团体享受同等待遇，靖国神社终于逃过了灭顶之灾。

罗马教廷代表劝阻麦克阿瑟，美为冷战考虑保留靖国神社

1946年4月，靖国神社接到盟总的新通告，禁止天皇参拜靖国神社。接着，在中国、苏联等国的强烈要求下，美军用水泥将靖国神社内纪念日军侵略战争的13米高的大石灯笼抹平。11月，盟总又发布了关于靖国神社的新指令，指出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神社，不承认将国有土地转让给神社，靖国神社存在的合法性再次遭到了质疑。1951年9月，盟总批准了土地转让事宜，靖国神社最终得以苟延残喘。此时的靖国神社虽已降为一般性的宗教团体，但神社中供奉的战争亡灵的灵位并没有撤除。

随着1952年美军占领时代的结束，各种祭拜靖国神社的活动相继“死灰复燃”。靖国神社摇身一变成为少数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政治舞台。

至于当年美军为何没有烧毁靖国神社，据说是麦克阿瑟征询了罗马天主教教廷驻日代表比特神父的意见后，中止了烧毁靖国神社的计划。然而比特神父仅靠一人之力就能保住靖国神社么？真正的答案显然不是这样。

几十年后，一份盟总的解密文件揭开了谜底。这份名为“关于靖国神社的将来的见解”的文件赫然写道：“应该保留靖国神社，废止恐怕反而会增加事端。”文件指出了没有废止靖国神社的理由——美国人担心这不利于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正如巴斯后来在接受日本 NHK 电视台采访时回忆说：“继续制裁日本，不是我们的愿望，那时的日本，正按照我们的期望在行动。”当时，随着冷战的激化，美国大幅度改变了占领政策，不但停止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而且打算将日本建造成“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自然不希望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得罪日本人。因此，对当前日本的靖国神社问题，美国人当年的自私行径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解字·

“分”



①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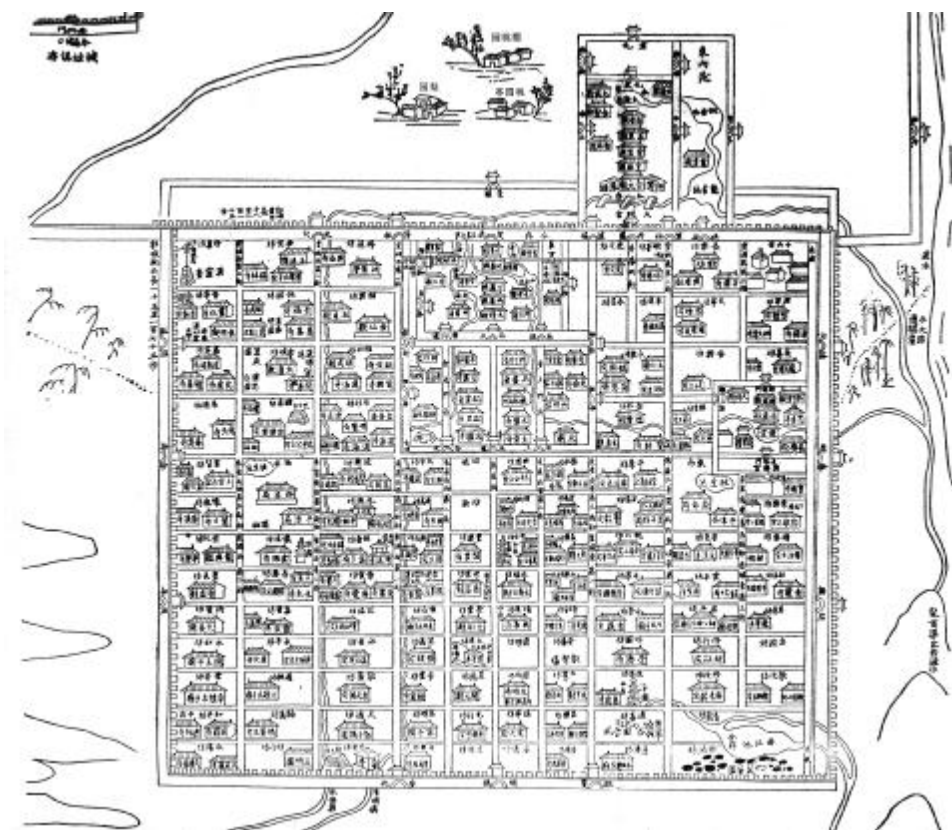
④

这个“分”字也是个会意字。甲骨文①的外面是个“八”字，当中是一把“刀”，“以刀判物谓之‘分’”，也就是说：用刀把一个东西割开就叫做“分”。②是金文的形体，中间的刀形更为形象。③是小篆的形体，与甲金文字完全一致。④是楷书的写法。

“分”字的本义是“分开”，如：“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至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中的“分”字应解释为“分辨”，是从本义中引申出来的。从“分开”之义又可以引申为“一半”的意思，如《列子·周穆王》：“人生百年，昼夜各分。”也就是说：人活一百岁，白天与晚上各占一半。

请注意：“各守其分，不得相亲”（《淮南子·本经训》）中的“分”字当“名分”或“职分”讲。这里的“分”字你若读为 fēn（芬）就不对了，这里必须读 fèn（奋）。再比如《汉书·苏武传》：“自分已死久矣。”这里的“分”字当“料想”讲，必须读 fèn（奋）。当“格外”讲的“分”字也应读作 fèn（奋），如：月到中秋分外明；粗茶淡饭分外香。这两句话中的“分”都必须读作 fèn（奋），是“格外”或“特别”之义。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一)——景曜门

隋唐长安外郭城北面中门,实为禁苑南门之一。遗址约在今西安西北郊丰禾路北张家村。

1.景曜门左宏福寺

在景曜门前左侧修德坊的西北隅,有一座著名的佛寺,即宏福寺。此寺为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其母太穆皇后追福而立。寺中有十光佛院,院宇极为壮丽。北有果园,并有藕花池二所。唐太宗曾广召天下名僧居于此。著名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后,从贞观十九年至二十二年(645—648),即居住此寺西北禅院翻译佛经。当时除玄奘主译之外,朝廷还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分别担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协助译经。著名的《菩萨藏》等佛经,及由玄奘口述,僧人辩机记述的《大唐西域记》,就是这个时期在宏福寺翻译和完成的。寺内有碑,面文为贺兰敏之所

写《金刚经》,阴文为寺僧怀仁集王羲之字写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为时所重。

2.景曜门前千福寺

在景曜门前安定坊的东南隅,有座千福寺。此寺院本为章怀太子之宅,高宗咸亨四年(673年),括宅立为寺。千福寺额,为上官昭容所书。东塔院额,高力士所书。西塔院有王维所画掩障。寺中另有著名书法家杨惠之、僧怀素书及名画家杨廷光、卢楞伽、韩幹、吴道玄、李纶、尹琳画。寺中有高耸的多宝塔。唐人岑参有《登千福寺楚金禅师法华院多宝塔》诗:“宝塔凌太空,忽如涌出时。”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 1991 年 3 月经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国家级高新区。多年来,西安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迅猛,综合指标位于全国 56 个国家级高新区前列。西安高新区在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全区累计转化科技成果近 10000 项,其中 90%以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列入国家各类产业计划居全国高新区前茅。

如今,西安高新区已成为关中——天水经济区中最大的经济增长极、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好、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是国家确定要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六个高新区之一,成为陕西、西安最强劲的经济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视察西安高新区。2005 年 6 月,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要将西安、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 6 个

高新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为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做出重大贡献。温总理的讲话,进一步彰显了西安高新区的自主创新特色;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将自主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更加坚定了西安高新区发展自主知识产权高科技产业的信心和决心。西安高新区科技创新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2008 年 12 月,西安高新区与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无锡高新区一起,率先成为全国 56 个国家级高新区中的首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西安高新区连续多年保持综合竞争力等指标位列全国 56 个高新区第三位,连续多年保持 GDP30%以上增长。经济、科技资源活跃,被誉为“中国硅谷”。

2002 年 12 月,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评为六个“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 and 地区”之一。





户县社火

(富小云整理)

户县的社火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有芯子社火、平台社火、牛拉社火、马社火、背社火、掬火、高跷、竹马、旱船、大头和尚、打钱杆、热鳖、火龙、地龙、舞狮子等近 20 种形式。

芯子社火,是户县社火中最主要的形式。它以高、险、妙、悬的形式表现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戏剧情节。一般芯子高达 7.5—8.5 米,分四五层,芯子上系扎小孩最长达 24 人。

“背社火”又称“背芯子”、“背杆”,是用特制的架子绑在背者身上,架子上装饰有 12 属相等各种动物以及莲花、彩云等模型,上面站立一个或者几个三五岁的小孩,装扮成戏剧

中的各种人物,如同骑乘一般,跟随着大人的跑动一起起舞。背社火在表演时要踩着鼓点,边跑边舞,并且跑法讲究,有踩四角跑花尖、跑八字、经纬对流、卷白菜心等。

平台社火,是在大方桌上扮演神话、戏剧人物或生活故事的社火形式,它是清末以前户县各村的主要社火形式。平台社火最初由人抬行进表演,后变为牛拉,到农村出现拖拉机后变为车拉表演。

掬社火,是把孩子扮成戏剧人物,直接站在大人肩上跑动表演的社火形式

打钱杆,是以青年妇女为主要演员的民间舞蹈形式。钱杆是把三四组铜钱均匀穿在竹杆上并饰以红线缨子制成的舞

蹈道具。表演时演员穿红绿搭配的鲜艳服装,边舞边唱同时用钱杆在身上各个部位打出清脆悦耳的节奏。

热鳖,是以锣鼓伴奏,演员着古装戏衣,画脸谱,随着剧情蹦、跳、翻、转,做出互相呼应的戏剧动作,不说不唱,当地人也叫哑巴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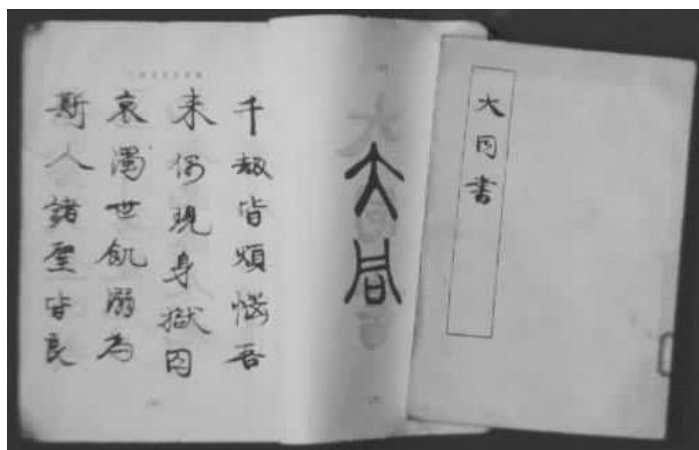
耍活子,户县人传统上把竹马、旱船、大头和尚、火龙、地龙、狮子舞等形式统称为耍活子。

2007 年 5 月,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被定为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毛泽东与康有为的《大同书》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接触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后来他对斯诺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49年在他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

康有为对于这样一种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继承了并且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同时，他以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文化，包括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天赋人权学说，甚至生吞活剥地附会和征引。康有为后来坚决保皇反对革命，则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得来的“教训”。他认为法国革命，大乱80年，杀人几百万，如中国闹革命，必大乱几百年不可。1895年6月，他向光绪《进呈法国革命序》中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



仍，迄无安息，旋入洄渊，不知所极。”他从几千年来中外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因而形成的人类种种苦难境遇出发，主张去国界、种界、家界等等，以达到全人类都过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的幸福生活。他只凭主观愿望，毫无科学根据，来创造他的理想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的良方，自认为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今天的读者看来，他的有些议论不免荒诞无稽，甚至幼稚可笑，但作为先驱者寻找真理的热情，还是很令人感动的。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

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书写成,康有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8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等。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文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长沙)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

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于4月7日经八道湾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但是看来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的影响似乎更具体些。

《大同书》中其他一些意见,也对毛有所影响,例如其中说的“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而立私约,有期限,不名夫妇。”(第124页)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第192页)尤其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综合出家庭妨碍人类进入“大同之世”的14条公害:“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第191页)至于“农夫之乐”:则“坐得工金,听其挥霍,居得公室,逮匹同居,好学者有图书之益,中才者有听讲之教,食有公厨,游有公园,除每日工作数时外,悉皆自由。”后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则受到他的极力称赞。每天工作的具体时数:“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小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第

248页)《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大同书》中的“中国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麦,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药,广东之宜花果,北口外之宜牧畜,沿海之宜渔盐”(第240页)提法,多年之后是反映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了。难怪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到徐水县去时,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外,还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要求;主张全球性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肯定工人具有崇高的地位,“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第247页)。还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太平之世不立刑,但有各职业之规则”,“职规之外,立法四章”——“第一禁赌博”,“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贼屠伯”,激烈地反对“独尊”,从而描绘了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全部生产包括服务行业,都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康有为特别重视教育,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人人学到20岁,人人皆无恶习。“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明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

人所能测己。”总之,《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及其远远超越之处,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公正的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思想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当代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空想。”《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康有为的这些思想,“在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却占据着重要的进步地位,它比朴素的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已向前大大进了一步,它根据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发达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在这个社会主义主观空想形式里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

《大同书》在思想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却决不能作为制定现实政策的指导理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此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对此书的内容,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只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历史的不幸是,9年之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的毛泽东,作了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其代价之大,是人们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的。

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世人常把墓志铭当作墓碑文。其实，墓志铭和墓碑文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墓碑墓志的演变来了解它们的区别。

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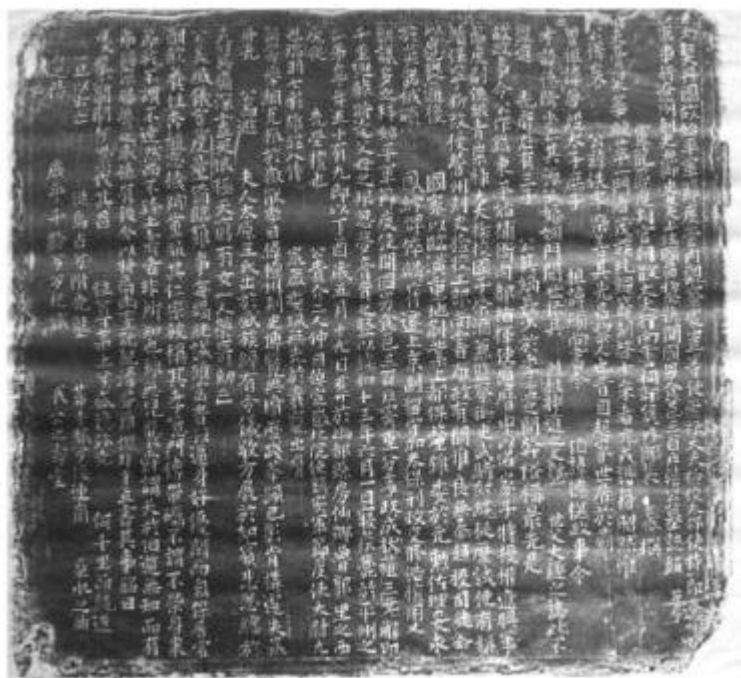
墓碑的使用是在东汉以后。东汉之前，碑的用法典籍记载有三种，一是作为测量时间的工具，竖立在宫室前测量日影。《仪礼·聘礼》记载：“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解：“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碑作为测量时间的工具，现今仍有遗存。河南登封观星台上，有一块石碑，正

面呈上圆下方形，上刻“周公测影台”五字，这是开元十一年(723)唐政府下令依照先秦古制立的一块测影石碑。

二是在宗庙前用来拴牲口。碑上有洞，叫穿，意思是绳子可以从中穿过，拴住那些用来祭祀的牲口。1997年，新郑郑韩故城战国宫城遗址出土了一块石碑，插埋于韩国宗庙遗址中，中下部有穿，证明石碑立于宗庙前就是用来拴牲口的。

三是用作下葬时绑系棺槨的柱子，一般竖立在墓的两旁，其规制在等级社会中有严格的规定。《礼记·檀弓下》记载：“公室视丰碑。”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絰绕，天子六絰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诸侯四絰二碑……大夫二絰二碑，士二絰无碑。”絰指的是粗绳子，按照郑玄的解释，天子可以用四个木碑，穿六根粗绳子下葬，而到了低等级的士，则不能有碑，只能用手挽着绳子下葬了。

从这些记载来看，石碑是用在宫庙前面的，而墓地前的碑，为木质，没有文字，只起到承载棺槨下葬的作用，与后世的墓碑，作用显然不同。



■大金故金紫光禄大夫乌古论公墓志

东汉立墓碑的习俗,应当和先秦、秦汉时期的刻石纪念、歌功颂德的传统有关。《墨子·兼爱》里有这样的记载:“古者圣王……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国家要刻石纪念,圣人要刻石明德。《礼记·祭统》说:“铭者,论撰其先祖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所以,刻字纪念成为传统。蔡邕在《铭论》里说:“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由于金铜材质的器物渐少,所以纪念性的墓碑就用石碑代替。我们今天发现的东汉初期的墓碑,如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韩仁铭碑都是有穿的石质墓碑。

墓志

简单地说,墓志是埋在坟墓里的石碑,所以它的其他别称都带有入土的意义,如埋铭、葬志、圹志等。

墓志在魏晋以后兴起发展。《宋书·礼志二》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禁止立碑,大概有以下两个原因。

1. 西汉中后期,世家大族建立祠堂、家庙,广立碑铭,刻石记其祖先功德,为的是团结族人,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如《汉书·叙传》记载:“(班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汉书·楼护传》说:“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

2. 碑铭是对逝者的歌功颂德,不免有很多赞誉之词,且多有虚假过誉之词。东汉时

期,私谥兴起。由于政治混乱,本是由朝廷给逝者赠谥,竟然泛滥于民间,如《后汉书·朱穆传》载:“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为文忠先生。”

曹操以禁止厚葬为名,禁止立碑,从而淡化士大夫们的群体意识,淡化世家大族的凝聚力。曹操立法的威严,使立碑之风受到遏制,但是人们依然按照立碑的风俗,把石碑立在墓地之内。这样,墓外无碑,而墓内有碑,一样达到虽陵谷迁改而勒石永旌的目的。

魏晋时期的墓志,仿照墓碑而制,直立在墓内,不像后世的墓志都是平放。其形状比墓碑略小,一般高不过一米,宽不过半米。碑额有圆首或圭首。

南北朝时期,墓志经过不断发展,已经逐步确定了其形制。我们看到的过渡期最具代表性的墓志就是南朝宋大明八年(464)的《刘怀民墓志》,墓志名为“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刘府君墓志”。这个墓志是方形石质,但是还没有盖,加盖的墓志是洛阳发现的北魏正始二年(505年)的《寇臻墓志》,志盖上写有“幽郢二州寇使君墓志盖”。这一时期墓志基本定型,为后世所效仿。

禁止立碑的政策至隋唐之时,已基本解禁。但是相较于碑,墓志的使用却更加频繁。埋藏墓志成为封建官员、世家子弟以及贵族家庭葬礼中的普遍器物,它的功用是墓碑代替不了的。明代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里说出了原因:“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竖立在墓地前的墓碑,会因为战乱灾害人事变迁等原因被损毁,

而随同棺椁埋在一起的墓志，则一般不会被毁坏，它的长久保存性更强，所以，虽然禁碑之令后来有所松动，但墓志因为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被保存并传承下去了。

墓碑文和墓志铭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其序则传，指碑文主要叙述死者的姓氏、籍贯、世系以及生平事迹等；其文则铭，是指后面还要配以铭文，以韵文的形式来对死者进行歌功颂德。

墓志铭虽由墓碑文发展而来，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黄金明在《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中说得很详细：“就文体功能而言，碑文更注重铭颂德勋，墓志虽也记德铭勋，又很注重记事。就文体形式而言，碑文序韵散结合趋于骈丽，铭为四言韵文，墓志则以散为主，又有杂五言、六言、七言。碑文于序中更见辞彩，墓志于铭中更显文丽，故古代文章选集如《艺文类聚》碑文主要选其序，墓志则多选其铭。”

魏晋南北朝时期，碑文墓志铭的写作多以骈体韵文出现，内容隐恶扬善，意少语多，铺陈藻饰，成为一种程式。自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其写作侧重于平铺直叙，减少了韵文，以散文为主，骈散结合，明白晓畅。



清宫选秀女 并非选美

人们常认为秀女应有沉鱼落雁之貌，然而，靓丽的容貌是否是当选秀女的主要标准呢？这里有一张清末应选秀女的照片，似乎很难将这些面孔与任何一个表述美貌的词汇联系起来，非但如此，少女们爱美的天性也成了非分之想。

清朝“选秀女”制度相当严格。清代的后宫，上至皇后，下到宫女，都是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出来的。旗人，是清朝独有的。因此，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后宫粉黛的制度，也是清代独有的。

挑选秀女的目的，除了充实皇帝的后宫，就是为皇室子孙拴婚，或为亲王、郡王和他们的儿子指婚，重要性自不待言。秀女们要走进紫禁城高高的宫墙，也就不那么简单了，必须经过一道道的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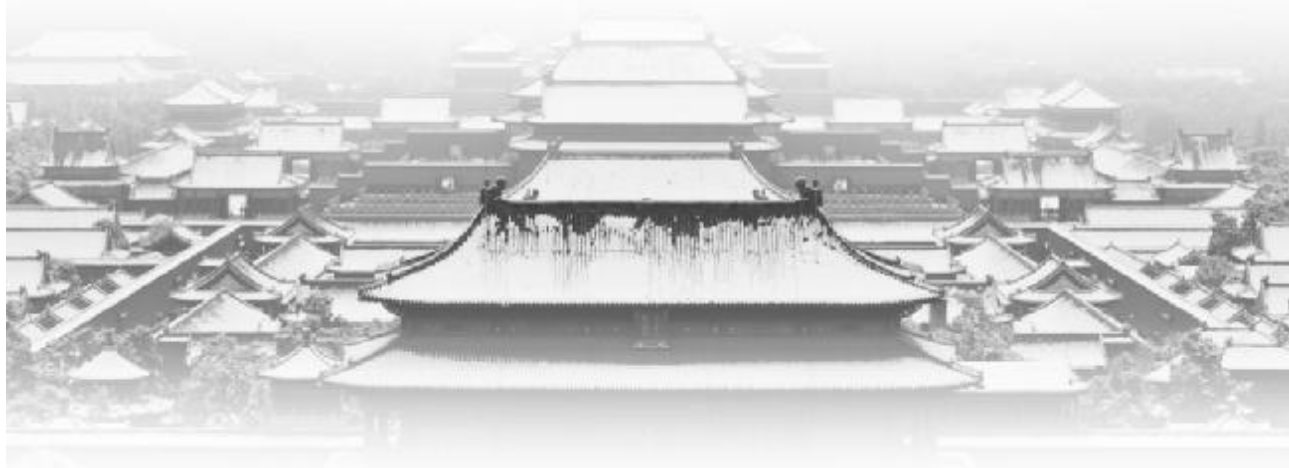
首先,要严格审查旗属与年龄,不在旗的想参加选秀,势比登天;在旗的想逃避选秀,也是自讨苦吃。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军八旗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备选秀女,17岁以上的女子不再参加。乾隆5年(1740)进一步规定,如果旗人女子在规定的年限之内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阅选,下届仍要参加阅选。没有经过阅选的旗人女子,即使到了20多岁也不准私自聘嫁,如有违例,她所在旗的最高行政长官——该旗都统要进行查参,予以惩治。

每到准备挑选秀女的时候,先由户部奏报皇帝,奉旨允准后,立即行文八旗都统衙门,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层将适龄女子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由户部上报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日期。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用骡车提前送到京城。由于众多秀女的家庭背景不一,官宦人家尚有车辆,而兵丁之家只能雇车乘坐。因此,乾隆时规定:“引看女子,无论大小官员、兵丁女子,每人赏银一两,以为雇车之需。……此

项银两,……著动用户部库银。”秀女们抵达京城后,在入宫应选的前一天,坐在骡车上,由本旗的参领、领催等安排次序,称为“排车”,根据满、蒙、汉排列先后的次序。最前面是宫中后妃的亲戚,其次是以前被选中留了牌子、这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分别依年龄为序排列,当应选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走下骡车后,先由户部司官维持秩序,再由太监引入宫中。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这叫做留牌子;没有选中的,就撂牌子。然后,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复选,复选而未留者,也称为撂牌子。经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还有两种命运:一是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一是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

清朝明确规定,八旗秀女阅看时,必须着旗装,严禁时装。清统治者公开的两条标准,一是品德,一是门第。其中,门第又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的相貌奇丑,但她是慈禧皇太后的侄女,因此,她成了皇后。所以,清宫选秀女,绝非选美。



杜甫八方求援盖“草堂”

杜甫生活于公元 712 年—770 年，是盛唐时期诗人，其名言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话，成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标签，带给了他一顶现实主义风格的“诗圣”桂冠。

笔者曾去杜甫的出生地河南巩县、安葬的墓园和生活过的成都草堂看过。每处看罢，心里都会想：杜甫家里当年真的穷得只能住破草房？杜甫曾在长安呆了 10 年，与今天许多“北漂”一样，杜甫也想在京城混出个模样来，也想当大官、发大财。于是，他选择当“西漂族”，来到长安（今陕西西安）打拼。

但杜甫运气不好，只做过小官。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因为有才、敢说，杜甫曾在“唐中央部委”工作过——任左拾遗，后人称他为“杜拾遗”就是这原因。“拾遗”是干什么的，说白了就是给皇帝和朝政提意见、挑毛病的闲差，很多情况下就是个摆设，可杜甫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官，直言进谏，结果惹怒了唐肃宗李亨被贬华州（今陕西华县）。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年底，杜甫来到了成都，做节度使参谋，住在西郊外浣花溪寺里。杜甫在寺里没住多久，便打起了建私宅的主意。在唐朝，尚没有今天搞房产开发的概念，地皮也不值钱，所以次年春杜甫便在城西七里、风景不错的浣花溪畔，找到了一块荒地开始建房。

杜甫先是开辟了一亩大的地方，在一株大树下建了一间茅屋，这就是以后成都草堂的雏形。能自己找地皮建房，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没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关系，谁敢想？果然，杜甫盖房的消息甫一传出，他在朝中做官的高适、严武等朋友便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的表弟王十五来看望他时，还送来了盖房资金，“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

盖房子的同时，杜甫又向各处朋友求供果木树苗，清单如下——

向萧实要 100 根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肖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向曾做过绵竹令的韦续索取绵竹县的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

向何邕要蜀中的桤树苗。

向果园坊园主徐卿索求果花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诣徐卿觅果栽》）

向韦班要松树苗：“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显然，杜甫盖房子不只地皮没有花钱，连美化环境的花草树木也不用掏钱去买，都是他人提供的。

中国最早四位女留学生的故事（一）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在遍布世界的中国学子当中,不乏女性的身影。然而,回望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尽管当时已西风东渐,但女子们普遍都还缠着足,笃信“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垂手伫立在男人的身后,至于出洋留学,那简直是传奇中的传奇。

在当时的中国,偏偏就有四位年轻的女子大胆地迈出了令国人惊诧的一双天足,漂洋过海到美国的大学去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并且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最后还都做了报效祖国的女“海归”,以所学救助同胞,服务社会。

这四位女子分别是金雅妹、许金匄、康爱德和石美玉。她们出国的时间是 1881 年至 1892 年之间,那会儿甲午战争还没打响,大批留日留美的中国学生还没出发。所以,她们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女留学生。

她们本是普通的中国女子,却有着不同常人的经历。传奇或许不可复制,但她们的故事值得



金雅妹

我们记取。

金雅妹：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

1881 年的一天,一艘客轮从东京启航驶往纽约,乘客中有一个黑头发黄皮肤、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她就是金雅妹(又名韵梅)。这一年,她 17 岁。

航程漫漫,天晴时,金雅妹喜欢站在甲板上观看海鸥逐浪的有趣情景,间或会想起久违了的故乡——宁波东钱湖畔的韩岭村,只是父母双亲的模样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在她两岁半时村子里闹瘟疫,担任教会牧师的父亲和母亲未能幸免,相继染病去世。抚养她长大的是父亲生前的好友麦嘉谛博士(Dr.D. B.McCartee)和他的夫人。麦嘉

谛是美国人,1844年便来华传教施医,是宁波长老会的医生,曾担任美国驻宁波首任领事。1869年他回到美国,一年后又来宁波和上海工作,1872年被聘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并在日本的中国公使馆担任顾问。在此期间,金雅妹一直跟随着他,在这些地方辗转度过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并在日本读完了中学,掌握了日文和英文。看到义女天资聪颖,喜爱读书,麦嘉谛决定送她去美国深造,他为她选择的专业是医学。

在海上颠簸数周后,金雅妹终于抵达了美国,进入著名的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学习,成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四年间,她学习认真用功,在研读书本知识之外还勤于操作实验,学习使用各种医疗器械,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885年5月,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从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她禁不住心潮澎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她会成为一名深受病人欢迎的女医生。但她也许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将作为中国第一名获得毕业证书的女大学生和第一位女留学生而闪耀史册。

毕业后,金雅妹先后在纽约、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的一些医院里实习。她理论知识扎实,实践技术精湛,对刚刚兴起的显微医学研究有特殊心得,很快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1887年,她的学术报告《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刊出,引起了医界同行的重视,当时她只有23岁。其后,她又陆续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探索成果,在当时的纽约医学界小有名气。

少时离开中国,在日本念中学又在美国学习工作了八年的金雅妹,已经习惯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且在美国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优越的生活,但是幼时父母因祖国的医疗技术落后而亡故的惨痛经历一直烙印在她心里,她希望有一天可以尽自己的力量解除同胞们饱受疾病折磨的痛苦。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她在1888年底毅然回到了祖国,到福建厦门一家教会医院工作。

一年后,金雅妹因病前往日本神户治病,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家兼语言学家,并与之相爱。1894年,30岁的金雅妹结婚了,两年后生下一个男孩。但是夫妇感情并不融洽,勉强维持了10年之后离异,孩子留给了男方。不幸的是,这个孩子成年后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失败的异国婚恋和丧子的痛苦,金雅妹并未就此消沉,而是将余生的精力全部投入了医学事业。

1905年,她再度回国,先后在广州、成都等地开设私人诊所。她医德高尚,医术精深,对病人和蔼可亲,因而深受病人欢迎和信任。

1907年她来到天津,出任北洋女医院院长。北洋女医院(局)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女医院,是1902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建立的,院址在东门水阁大街(即后来的天津水阁医院,南开区妇幼保健院,现已拆)。在她的主持下,医院办得井然有序,前去求诊者络绎不绝,成为当时天津的名牌医院。在1911年的前10个月中,医院施治病人达1.6万余名,

其附属养病院住院病人有 180 余名。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后被聘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的著名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有两个儿子就是由金雅妹亲自接生的，她与伍连德的太太黄淑琼也成了好朋友。

在行医过程中，金雅妹深感国内妇婴医疗条件的落后，培养专业医护人员刻不容缓，1908 年她说服了袁世凯，由天津海关拨银二万两，创办了北洋女医学堂，由她担任堂长兼总教习。这是天津的第一所女子护士学校，也是我国第一所公立的护士学校。

护校附属北洋女医院，开设产科、看护两科，课程内容主要包括通用药理、卫生、种痘等学科，以二年为修业年限。学堂招收贫寒人家读过书的女孩入学，原定招募学员 40 名，由于风气不开，参加报名考试的人并不多，第一届招考工作持续了一年，只招到了 30 名学员。倔强的金雅妹并不气馁，她请出了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出示晓谕，其有未经报名者，并准其于考期以前到堂注册，届时一体与试，按格录取，以广造就”。

女医学堂不仅传授西方先进的护理技术和理念，还提倡妇女解放，参与社会服务。学生边上学边到医院实习，做卫生及初级护理工作，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为此，金雅妹特聘通晓中文的英国女医生卫淑贞为实习教习，聘中国第一位护理专业女留学生钟茂芳任看护教习。她还亲自授课，将在国外学到的医学知识和她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诊断技术，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

两年后，北洋女医学堂头班何渊洁等 11

人毕业，金雅妹亲自设计了“毕业凭照”，盖印过朱。次年又有 5 人毕业。尽管青杏尚小，但这毕竟是近代中国自行培育出的第一批护理人才，影响深远。这些女学员们服务于各个医院中，使津门妇女率先告别了“接生婆”时代，享受到西方先进的接生技术。

1916 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后，天津海关竟拒绝再为女医院拨付经费，医院由天津近代教育家严范孙等人接办，由公办转为官商合办，女医学堂改名为天津女医局附设护士助产学校。金雅妹随即辞去了院长与校长之职，离开天津，定居北京。

1933 年，金雅妹在北平的寓所里“收留”了一名到中国做学术考察的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小伙子——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Prusek Jaroslav, 1906-1980)，后来他成为了著名的汉学家，并在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一书中记叙了在北平的这段日子。在他的笔下，晚年的金雅妹真是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普实克深情地写道：“在她的宅子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家。许多外国人受到她严厉批评的威胁，也许他们无法理解她那貌似严厉的善举。她待我像妈妈。疾病花掉了我所有从家里带来的钱，我还欠了债。但是她总是微笑着说，让我用银行的支票付房钱，其实我那银行账上剩下的是已经不可以支取的五个银元。她说等我有了更多的钱，就可以提出来支付。她的厨师用肥美的鸡肉使我又能够站稳脚跟了。”

金雅妹身边除了仆佣之外，没有一个亲人，但她乐于结交朋友，也深受朋友欢迎。“她

喜欢在身边聚集一些青年人，而且我可以邀请我所想邀请的人来品尝她那久负盛名的晚餐，尤其是她的菊花汤。这种汤她是当着客人的面用小木炭炉子煮的。”“如果没有客人前来，她就坐在客厅的壁炉前，裹在自己的皮大衣里——北平的夜往往非常的冷——她在那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金雅妹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热心于教育事业和农村卫生事业。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亲自带一批人去孤儿院做义工，并为孤儿院募集善款，还热情支持燕京大学社会部主办的旨在扶贫的清河实验中心的工作。“她68岁了，但是仍然十分活跃。每天下午一位女子来为她朗读中国小说。老太太还在打字机上翻译英文。她虽然讲汉语，带点口音，但是却不识汉字。她接受的是外国教育。她担任了管理纺织厂的职务，这个作坊是燕京大学在海淀的一个乡村办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国内的工业，复兴中国的花边织造和刺绣业，收集由中国妇女和儿童剪出的异常美丽的剪纸花样，把它们作为样本进行刺绣。”

普实克还描绘了金雅妹对美食的追求——“老太太还买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回家来吃，别人都不知道她是在哪家铺子买的……”她对天津的饮食也有着特别嗜好：“老太太还从天津买来过咸虾、咸鱼，用糖色、杏仁和葡萄干炖。甜食里有冰糖苹果块。他们厨师的拿手菜是肉丝炒竹笋、香菇和各种各样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蔬菜。”南方故乡的米酒，也深受金雅妹的喜爱。普实克生动地叙述说：“吃饭的时候喝绍兴县出产的米酒，烫热了

喝，锡制的酒杯很小，只有一个顶针那么大。酒颜色鲜红，味道又辣又甜，比我们欧洲的蜜酒好喝。”

1933年9月21日，金雅妹在北平扶轮社（美国律师哈里斯发起的公益性国际团体）作题为“中国两代妇女”的演讲，这是她最后一次公开讲话。1934年2月，她患肺炎住进了协和医院，她比所有的人都清楚自己的病情，把所有的财产——在北平的寓所（价值15000元的房屋和地基），并现金6000元，全都捐给了燕京大学。因为她是基督徒，所以对燕大怀有特殊的感情。她还将150余卷外文书籍捐给了天津木斋学校。

1934年3月，这位杰出的女性在协和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美国著名医生、林巧稚大夫的老师马克斯韦尔（John Preston Maxwell）撰写了悼念文章，发表在英文版《中华医学要志》上。文中这样写道：“她是一位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和不幸的女性。这个世界对她过去似太无情。更为重要的是，她竟为这个国家的孩子和工人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并称赞她是“国际医学界的著名专家”，“一个有卓越才能和秉性的女子”。





蛇年说蛇

蛇是很奇怪的一种动物，因为它看上去柔弱无骨，却是脊椎动物。而且，蛇的脊椎多达数百块，每块都很小，这让它可以灵活地扭动。在陆地上的脊椎动物中，也只有蛇没有脚，所以有成语说“画蛇添足”。其实，蛇的远古祖先是四足的，现在的一些蟒蛇还有很细小的残余后肢。

蛇能吞食比自己粗得多的动物，这是因为它的嘴巴下颌很松，关节可以脱开，因而嘴可以张得很大。蛇没有坚硬的胸骨，这令它可以把粗大的食物不断吞到胃中，而不会胀破肚皮。蛇捕食虽然凶猛，但是吞食之后要消化则耗时耗神，大的食物需要静静地消化几天，此时它容易被天敌捕食。蛇有密密匝匝细小的肋骨，像鱼刺一样，这些肋骨和鳞片一起给它们提供前进的推力。

蛇在世界上的分布很广，除了南极洲外，其他陆地和海域都有分布。各种蛇的体型差异很大，大的有十几米长，小的只有几

厘米长。

■ 最鲜艳的蛇

世界上最鲜艳的蛇是红边袜带蛇，它们有色差十分明显的红蓝白三色斑纹，红色的头部尤其醒目。它们是一种 60 厘米长的小型蛇，稍稍有毒，主要以昆虫、蚯蚓、鱼类和蛙类为食，特别喜吃蛙类和鱼类。它们生性胆怯，不但不主动攻击人类，受到人类或其他天敌惊扰时还将头藏起，尾部蠕动，同时从肛门腺中以放臭屁的方式来驱逐天敌。

■ 最大的蛇

蛇中体型较大的都是蟒蛇，其中最大的是网纹蟒。网纹蟒体长 8 米左右，而已经发现的最大的一条蛇是印度尼西亚的一条名为“桂花”的网纹蟒，其体长居然有 14.85 米，体重有 447 公斤。网纹蟒虽然无毒，它的缠绕力却很强，号称世界上绞杀力最强的蛇。野生网纹蟒性情粗暴，曾有过吃人的记录。

■ 最毒的蛇

一提到毒蛇，我们会想到眼镜蛇或响尾蛇，要不就是中国民间传闻的“七步倒”毒蛇。其实，世界上最毒的蛇并不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澳大利亚海域中的艾基特林海蛇。它们多生活在海湾浅水带，时常张着一张大嘴，其躯干略呈圆筒形，体细长，后端及尾侧扁平。它们的毒性比眼镜王蛇还要大，如果人被它咬一口，10分钟内就会死亡。它们分泌的是一种神经性毒液，猎物中毒之后肌肉迅速麻痹，呼吸衰竭，心脏停止跳动。

■ 最细小的蛇

世界上最细小的蛇是卡拉细盲蛇，只有10厘米长，细得有如意大利面条一样，小到足够蜷缩在一枚硬币上。由于这种蛇很小，它只能以白蚁及蚁卵为食。由于身体较小，雌性卡拉细盲蛇每次产卵只有一枚，不像其他蛇类往往产好几枚卵，不过它们孵化出来的幼蛇一点也不小，有母蛇的一半长。卡拉细盲蛇十分珍稀，只生活在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海岛的森林中。

■ 长“鼻子”的蛇

蛇并没有明显的鼻子，只在头部有两个出气的鼻孔。只有一种蛇看上去似乎有一个长鼻子，因此被称为长鼻树蛇。其实，这种蛇也没有鼻子，那个所谓的“长鼻子”其实是它尖细的上颌。它的鼻孔依然在眼睛前部，而不是在“长鼻子”的末端。长鼻树蛇的颜色是绿的，再加上藤蔓植物一样的体型便于伪装。长鼻树蛇栖息在热带森林中的树林和灌木丛中，主要以蜥蜴、青蛙为食。

■ 会飞的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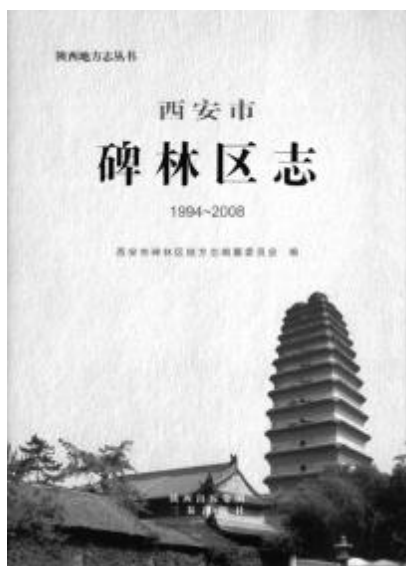
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生活着一些会飞的蛇，它们是天堂金花蛇。这种蛇最喜欢用尾巴将自己挂在高高的树枝上晃动，然后就是突然从10多米的高度飞向地面。对其他蛇类或者爬行动物而言，这样的行动无异于自杀之举，飞蛇却能安然无恙。美国研究人员用电脑分析后发现，天堂金花蛇充分利用了空气动力学原理，它们在离开树枝后会将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平面”，然后借助身体的左右起伏波动来获得空气浮力，让自己安全地滑翔。

■ 长鳞角的蛇

传说中的龙都头部有角，而号称“小龙”的蛇中只有角响尾蛇长角。这个非常明显的角却和其他动物的角不太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角状的鳞片。目前，尚不清楚它这个角有什么用途。角响尾蛇像其他种类的响尾蛇一样，尾部有鳞片转化而来的响环。角响尾蛇生活在沙漠中那些被风吹过的松沙地区，横向伸缩身体不断前进。角响尾蛇在夜幕降临后不久就开始捕食，主要以鼠类等啮齿动物为食。

■ 有“天线”的蛇

世界上只有吻突蟒蛇长有“天线”，那其实是它们探测周边环境的吻突。吻突蟒蛇生活在淡水水域中，经常潜伏在淤泥中，只把“天线”般的吻突伸出来。一旦水中出现附近有小鱼小虾等小动物活动，吻突能探测到水流的变化。另外，它的吻突看上去像小蠕虫，也能起到诱饵的作用。



续修《碑林区志(1994~2008)》自2004年启动,历时8年,于2012年年底正式出版发行,是陕西省第二轮修志第一部出版发行的城市区志。该志综合运用志、记、传、述、图、表、录等形式,上接前志,下记碑林区行政区域1994~2008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全面记载了碑林区人民

《碑林区志 (1994~2008)》 正式出版发行

◎ 吉 勇

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砥砺前行新取得的辉煌业绩。全书主体设24个专业篇目,志前设序、凡例、总述和大事记,志末设附录和后记30个部分,121个类目、380个条目条、507个子目,计100万字,有213幅历史和当代各类图照。观点明确,结构合理,内容翔实,详略得当,行文规范,语言文字简明流畅,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突出。

《西安百年大事要览(1911—2010)》出版

2012年12月,《西安百年大事要览(1911—2010)》面世。该书由西安市地方志编纂,西安出版社出版,总字数40万字。全书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部分,记述了1911年西安辛亥革命爆发至2010年间西安的大事、要事、新事、特事,以时为序,一事一记,力求溯寻西安的发展脉搏、文化轨迹,总结西安历史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西安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宣传西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激发广大市民把西安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热情,为西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年鉴处)



《那时长安》 出版



2013年1月,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那时长安》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任主编,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敏杰任副主编。该书分九个部分:长安城这样演变、长安城的对外交流很广泛、长安城的文化很繁荣、长安城的宗教很兴盛、经

营长安的人很聪明、走出长安的人很伟大、来到长安的人很幸运、生活在长安的人很幸福,图文并茂,以汉唐长安城的国际化为主线,全面介绍汉唐长安城的国际化元素和文化内涵,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缓堵保畅西安行(一)》出版



2012年12月,《缓堵保畅西安行(一)》出版。该书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和西安日报社共同编纂,内部印刷出版,总字数15万字。主要包括:西安市交通拥堵的现状和交通的一些乱象,领导对此开展的调研活动,针对交通拥堵的现状所制定的文件法规,采取的缓堵保畅措施,各单位所作出的承诺,采取的教育措施,以及社会各界对此的反响等。力求彰显市委、市政府及全社会在治理交通拥堵这一关乎社会民生问题的决心和办法,呼吁广大市民文明出行,进而激发出广大市民热爱西安,共建文明西安,建设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热情,为西安的快速发展鼓劲加油。

(年鉴处)

妙趣横生“元旦”谜

古往今来,以“元旦”为题材的灯谜很多。

如“细看园中景,旧貌变新颜。”首句扣“园”中之“元”,次句取“移位法”,将“旧”移位为“旦”,正合“旧貌”变“新颜”。“园墙四面开,但无人进来”,也打节日“元旦”,“园”字外面的“口”打开,剩下的就是“元”,“但”字没有了“人”成为“旦”。“查完一半,对调位置”,就是把“查完”二字的上半截截去为“旦元”,再对调位置,恰好就是“元旦”。“园中一轮明月升”,“园中”扣“元”,“一轮明月升”中“明”字中的“月”升起,再加“一”,又恰扣“旦”字,这些都属于“拆字谜”,可见制谜者的独具匠心。

还有一个对联灯谜“隋后岂只唐宋明清,戏角何止生丑净末”谜底当然也是“元旦”。说

到戏剧,旧时有一谜:“元旦”,打《西厢记》二句:“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元”解作状元的简称,“仕女班头”指才貌双绝的女中领袖,以“旦”扣之。更有人以“伶界大王梅兰芳”制谜,因梅兰芳

名居“四大名旦”之首,“元”是“第一”的意思,“旦”作“旦角”解释,这是会意扣合。

生活中以“元旦”制谜的更多。如“元旦放假”,猜一储蓄名词“年息”;“前面分明是十角,后面一看成一角”,还是“元旦”。这里的一“元”即十角,而“旦”却是指另一角(戏剧角色),前后扣合,谜味浓郁。“元旦寄信”,猜一集邮名词“首日封”;元旦结婚猜一城市名“重庆”;“元旦光临”猜一朝代名“明朝”;“元旦离家除夕回”,打成语“满载而归”,“元旦献词”,打学校用语“第一节日语”,谜底须顿读成“第一节日/语”,元旦正是新年的第一个节日,“献词”猜“言语”,熨帖妙合,谜趣横生;“元旦写生”谜底为“新年画”“元旦合影”打一音乐名词“节拍”……

何为『古籍善本』?

什么是古籍善本呢?

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但是在现在古籍善本的概念已经大大扩展了。



古籍善本保存有三忌

忌用化学胶水等修补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性,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红黄绿灯之源

今年伊始,公安部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23号)开始正式施行,其中引起人们关注最多的地方就是“闯黄灯”或涉嫌违法,将会被扣除6分。所谓红绿灯“指挥”交通的标准,说的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并没有对涉及黄灯的“停与行”作出定论,甚至很多城市街口的交通信号灯仅有红绿颜色,没有黄色指示灯。那么,红黄绿灯到底从何而来?

纺织工人发明最早的红绿灯

古代人们出行并没有统一的交通规则,大多以身份等级和交通工具的差别来加以区分。在欧洲,贱民和奴隶要为平民让路,平民则要为贵族让路。在我国,多以官职大小作为行路避让的准则。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尤其是高

速马车和汽车的出现，仅靠约定俗成的交通习惯已无法保证交通通畅，也无法保护行人和车辆安全。于是 1868 年的英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指挥交通功能的红绿灯。据说，之所以选择红灯禁行、绿灯通行，是参考了英国约克郡当时女士的穿衣风格：穿红裙表示已婚，绿裙表示未婚。其实并不是这样，当时人们对光谱物理学已经有所研究，红色穿透力最强，所以作为禁行标志，与之相对应的相反颜色就是绿色，所以被选择用来表示通行。

有趣的是，首先发明红绿灯的人竟是一位纺织工人，他想出了用灯光颜色控制交通的办法，并于 1859 年带着一盏有活动遮檐设备的油灯来到伦敦，但是，这个发明却遭到嘲笑。直到几年以后，英国街头高速马车频繁肇事，政府才想起这项发明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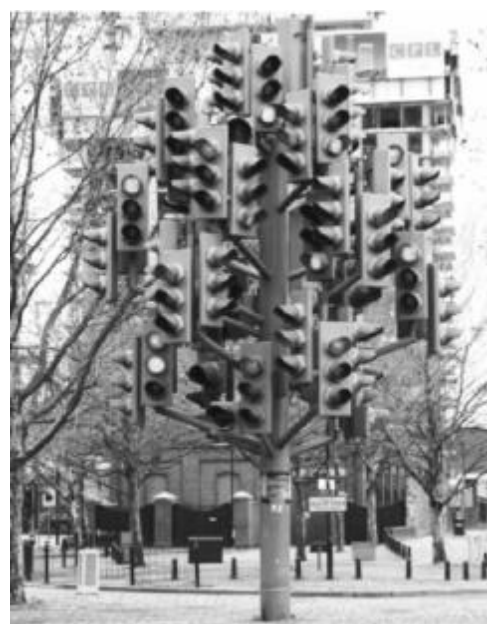
1868 年 12 月 10 日，信号灯家族的第一个成员在伦敦议会大厦的广场上诞生了，由当时英国铁路信号工程师德·哈特设计、制造的灯柱高 7 米，身上挂着一盏红、绿两色的提灯——煤气交通信号灯，这是第一盏信号灯。在灯脚下，一名手持长杆的警察牵动皮带转换提灯的颜色。不幸的是，面世 23 天后煤气灯突然爆炸，使一位正在值勤的警察因此断送了性命。从此，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被取缔了。直到 1914 年，在美国的克利夫兰市才率先恢复了红绿灯。

黄灯问世缘于车速提高

黄灯的普及要稍微晚一些，黄灯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车辆行驶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如果说时速 20 公里的车辆可以及时在绿

灯转换到红灯之时停下的话，那么，时速在 40 公里的车辆要及时停下就变得比较困难了：一是因为急刹车可能导致追尾事故，造成额外损害；二是按照物理惯性理论，骤然停止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很多中文资料都提出黄色信号灯的发明者是中国人胡汝鼎，时间是 1927 年，当时在美国深造的胡汝鼎想到在红、绿灯中间再加上一个黄色信号灯会更加安全。不过，据记载世界上第一盏红黄绿三色、四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是在 1920 年 10 月投入使用的，这盏由警察威廉·波茨发明的信号灯，被安装在了底特律伍德沃德大街和福特街的交会处。而用黄色代表“慎行”，铁路系统也很早就开始运用，1899 年，纽约、纽黑文和哈德福德的铁路系统就使用了三色灯，红色是“停止”，绿色代表“全部清除”，黄色代表“谨慎”。



伦敦街头的红绿灯雕塑



“疆场”原来是错别词语

俗话说“喋血疆场”，疆场就是战场。人们顺口就念出了这个词，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词竟然被误用了数百年！

“疆场”的“场”是个错别字，正确的字是“場”，读作“y”，右边从“易”，而不是繁体字的“場”。“场”和“場”的区别很大。“场”的本义是平坦的空地，《说文解字》解释为：“祭神道也。”祭神的时候，筑起的土堆叫“坛”，辟出的空地叫“场”。而“場”的本义是田界，孔颖达解释道：“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为易。”“疆”和“場”的区别是：大的田界叫“疆”，小的田界叫“場”，因此只能“疆場”连用，而不能连用作今天的“疆场”。

“疆場”是一个同义连绵词，本义就是田界、田边。《诗经》中的《信南山》一诗吟咏道：“疆場翼翼，黍稷彧彧。”“翼翼”是形容田界修理得很整饬的样子，“彧彧”是形容庄稼长得很茂盛的样子。接着又吟咏道：“中田有芦，疆

場有瓜。”中间的田里种的有萝卜，田地边上种的有瓜。“疆場”因为是田界，于是引申为两国的边境。《左传》中屡屡出现这个称谓。据《桓公十七年》载，齐国人侵略鲁国的边境，守卫边境的官吏告知鲁桓公，鲁桓公说：“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成公十三年》载：“郑人怒君之疆場。”郑国人侵犯秦国的边境。“疆場”一词都是这样的用法。

“疆場”既为边境，当然容易发生战事，因此“疆場”又引申为战场，直到元代之前，指代战场的从来就是“疆場”一词，比如杜牧的上表：“陛下用仁义为干戈，以恩信为疆場。”王安石的书信中有：“将帅之臣，出乘疆場，而有执敌捍患之材。”大约从元代开始，出身市民阶层的作家们开始眼花，把“場”字看成了“场”字，“疆場”也就自然而然变成了“疆场”，一直误用到了今天。

寒食

◎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官传蜡烛，
轻烟散入五侯家。

赏析：

寒食是我国古代一个传统节日，一般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清明前两天。古人很重视这个节日，按风俗家家禁火，只吃现成食物，故名寒食。由于节当暮春，景物宜人，自唐至宋，寒食便成为游玩的好日子，宋人就说过：“人间佳节唯寒食。”(邵雍)唐代制度，到清明这天，皇帝宣旨取榆柳之火赏赐近臣，以示皇恩。唐代诗人窦叔向有《寒食日恩赐火》诗纪其实：“恩光及小臣，华烛忽惊春。电影随中使，星辉拂路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贫。”正可与韩翃这一首诗参照。

此诗只注重寒食景象的描绘，并无一字涉及评议。第一句就展示出寒食节长安的迷

人风光。把春日的长安称为“春城”，不但造语新颖，富于美感；而且两字有阴平阳平的音调变化，谐和悦耳。处处“飞花”，不但写出春天的万紫千红、五彩缤纷，而且确切地表现出寒食的暮春景象。暮春时节，袅袅东风中柳絮飞舞，落红无数。不说“处处”而说“无处不”，以双重否定构成肯定，形成强调的语气，表达效果更强烈。“春城无处不飞花”写的是整个长安，下一句则专写皇城风光。既然整个长安充满春意，热闹繁华，皇宫的情景也就可以想见了。与第一句一样，这里并未直接写到游春盛况，而剪取无限风光中风拂“御柳”一个镜头。当时的风俗，寒食日折柳插门，所以特别写到柳。同时也关照下文“以榆柳之火赐近臣”的意思。

如果说一二句是对长安寒食风光一般性的描写，那么，三四句就是这一般景象中的特殊情景了。两联情景有一个时间推移，一二写白昼，三四写夜晚，“日暮”则是转折。寒食节

●历代诗人咏长安●

普天之下一律禁火，唯有得到皇帝许可，“特敕街中许燃烛”（元稹《连昌宫词》），才是例外。除了皇宫，贵近宠臣也可以得到这份恩典。“日暮”两句正是写这种情事，仍然是形象的画面。写赐火用一“传”字，不但状出动态，而且意味着挨个赐予，可见封建等级次第之森严。“轻烟散入”四字，生动描绘出一幅中官走马传烛图，虽然既未写马也未写人，但那袅袅飘散的轻烟，告诉着这一切消息，使人嗅到了那烛烟的气味，听到了那得得的马蹄，恍如身历其境。同时，自然而然会给人产生一种联想，体会到更多的言外之意。首先，风光无处不同，家家禁火而汉宫传烛独异，这本身已包含着特权的意味。进而，优先享受到这种特权的，则是“五侯”之家。它使人联想到中唐以后宦官专权的政治弊端。中唐以来，宦官专擅朝政，政治日趋腐败，有如汉末之世。诗中以

“汉”代唐，显然暗寓讽喻之情。无怪乎吴乔说：“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也。”（《围炉诗话》）

据孟棻《本事诗》，唐德宗曾十分赏识韩翃此诗，为此特赐多年失意的诗人以“驾部郎中知制诰”的显职。由于当时江淮刺史也叫韩翃，德宗特御笔亲书此诗，并批道：“与此韩翃”，成为一时流传的佳话。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形象大于思想”（高尔基），此诗虽然止于描绘，作者本意也未必在于讥刺，但他抓住的形象本身很典型，因而使读者意会到比作品更多的东西。由于作者未曾刻意求深，只是沉浸在打动了自已的形象与情感之中，发而为诗，反而使诗更含蓄，更富于情韵，比许多刻意讽刺之作更高一筹。

·名句欣赏·

【上士之耳训乎德，下士之耳顺乎己】——《法言·修身》

上：上等。训：顺。下：下等。

【百行以德为首】——《世说新语·贤媛》

行：行为。

【其名弥消，其德弥长；其身弥退，其道弥进】——《文中子·礼乐》

弥：愈，更加。长：增长。

【人有德厚，无问小节；人有大举，无訾小故】——《体论》

厚德：大的德行。大举：大的成就。訾：非议。小故：小的缺点。

【货贿为贤所贱，德行为贤所贵】——《亲贤第一章》

货贿：财物。为：被